



曾國藩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曾 国 藩

范咏梅 编著

目 录

一、时代与家世.....	(1)
二、读书与求仕.....	(6)
三、京师十二载	(12)
四、创办湘军	(16)
1. 墨经出山	(16)
2. 初办团练	(20)
3. 移居衡州	(24)
4. 编练成军	(28)
五、困守江西	(32)
1. 靖港惨败	(32)
2. 攻战武昌	(38)
3. 田家镇大捷	(44)
4. 二次投水	(48)
5. 坐困江西	(55)
6. 二次奔丧	(61)
六、决战安庆	(65)
1. 再次出山	(65)
2. 进军皖中	(68)
3. 强攻安庆	(72)

4. 总督两江	(76)
5. 拒不北援	(79)
6. 困守祁门	(82)
7. 攻陷安庆	(86)
七、攻陷天京	(90)
1. 三路进军	(90)
2. 进退之争	(93)
3. 血洗天京	(95)
4. 殊荣奇忧	(98)
八、剿捻失败	(101)
九、悒郁而死	(107)
1. 中兴幻想的破灭	(107)
2. 办理天津教案	(109)
结束语	(114)

一、时代与家世

18 世纪后半期，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带着它最后的辉煌一步一步地走进历史的坟墓。由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在经历了它的顶峰——乾隆盛世之后，逐渐暴露出了它日益腐朽的躯体。

其实在乾隆统治的后期，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就开始暴露：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紊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再加上乾隆后期重用奸相和珅，就更加速了这一腐化的过程。就在这“内囊已尽”的乾隆盛世之后，嘉庆皇帝即位。虽然他处死和珅，并惩办了一批罪恶昭著的官吏，但却无力扭转这一衰败的趋势。官场依然贪污不止，吏治仍是腐败日甚。这种情况直到道光皇帝末年也没有丝毫改变。

与政治上的腐败相同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军事状况也日趋恶化。首先是财政收入上的入不敷出。各大小官吏的腰包日渐鼓胀，而国库却日渐空虚，清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崩溃。其次，清政府的军队八旗军、绿营兵也都业已腐败，战斗力大大削弱。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负担日益加重，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人民群众为了生存，纷纷揭起起义的大旗，

反抗官府的黑暗统治。1774 年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举义旗，接着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此伏彼起，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引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于 1796 年首先在湖北荆襄地区爆发，很快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清政府征调半天下，耗银 2 亿两，花了 9 年时间才把它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契机。从此以后，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伏彼起，殆无宁岁。

然而，正当清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像西天的太阳一样无可挽回地迅速衰落下去的时候，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俄、美、德等国却正处于蒸蒸日上之时。

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西方列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侵略首先从鸦片的输入开始。鸦片是一种俗名“大烟”的毒品，久食成瘾，危害很大。外国侵略者就是用它来侵蚀中国人的肌体，麻醉中国人的精神，榨取中国人的钱财。鸦片的输入从 1770 年到 1837 年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从 200 箱骤增到 3900 万箱。由于鸦片的大量流入，一部分爱国的有识之士和广大劳动人民觉醒了，他们强烈要求禁烟。1839 年 6 月在爱国英雄林则徐的带领下，广州虎门曾经发生了著名的“虎门销烟”运动。英国侵略者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之举，以保护鸦片贸易为借口，于 1840 年 6 月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从此一步一步地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翻开了空前耻辱的一页。

人民革命的风雷，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贪婪攫取，封建反动统治者的荒淫堕落，在疮痍满目的中国大地上交织成一幅怵目惊心的画面。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被封建地主阶级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就出生在这样的年代里。

1811年11月26日（清代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深夜，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一声清脆的孩啼撕破夜幕，向陌生的人世展示了他第一曲生命的乐章。对于这个生命来说，这世界是神秘而未知的；对于世人来说，也无人领会这个生命将会对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有何等意义。只有那个家族，那个此刻正忍受剧痛和幸福巨大冲击的母亲，才真正从这声啼哭感悟到了生命的延续和造物的伟大。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要说的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他所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坐落在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榴山下，距离湘乡县城110余里。白杨坪地处丘陵山区，那里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是消息闭塞，文化相当落后。

曾国藩祖籍衡阳，清朝初年迁至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他的祖父又把家迁到白杨坪。

曾国藩的祖父叫曾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曾麟书排行老大，共兄弟三人，老二早年夭折，老三曾骥云没有儿子，后来曾麟书就把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曾国华过继给了他。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是湘乡处士江沛霜的女儿，是个生性倔强的女人。曾国藩曾经说过：“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曾国藩兄弟姐妹共九个人，一个姐姐，三个妹妹，四个弟弟，二弟曾国潢，三弟曾国华，四弟曾国

荃，五弟曾国葆。

曾国藩家族刚迁到湘乡时生活还很不富裕，直到他的高祖一代才日渐好转。到了他的曾祖父时，曾家已成了一个颇有田产的地主。但是这个家族一直与功名、科第无缘，从衡阳迁到湘乡的五六百年中，竟连一个秀才也没有出过。

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祖父曾玉屏。曾玉屏是个颇善经营的乡下财主，曾家的财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手上积攒起来的。但他年少时是个放荡游惰，只知挥霍家财的浪荡子弟，经常骑上大马跑到湘潭同一些纨绔子弟鬼混，或相逐于闹市，或日高酣睡。后来在亲友长辈的劝说下幡然悔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他亲自率领长工耕田种菜、养鱼喂猪。总之，他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家方法，把这个封建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曾国藩把他祖父的这些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祀祖先、邻里相好。这八个字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个乡下土财主的日常生活。曾玉屏不仅是个生财有道的小财主，而且还是个武断乡曲的小土棍，村中之人对他无不畏惧。邻里之间如果发生什么纠纷，曾玉屏就在中间充当调解人。如果有谁不服，他就大发雷霆之怒，声色俱厉，往往使这些人不得不就此罢休，有的甚至还要买酒亲自登门道歉，事情才算了结。在家里，曾玉屏更是个专制的暴君。在家庭事务上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对家人动不动就大加责骂。据说他对曾国藩的父亲更为严厉，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对他大声喝骂，丝毫不留情面。如果

他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家之后也会拿鞭子把曾麟书痛打一顿，而曾麟书此时还只能笑脸相陪。因此，直到曾玉屏去逝，他一直是这个家族的最高统治者。

曾国藩对他的祖父极为崇拜，认为他的言论、仪表都威严雄伟非常，虽然他和他的弟弟曾国荃后来都做了很大的官，但他们的威严程度和智谋韬略都远远不及他们的祖父，并且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才使他祖父终老山林而未能一展宏志。曾国藩说他祖父经常教育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奇耻大辱，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话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曾玉屏的一举一动，无不对年青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曾玉屏培养了他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刚愎顽固的个性与坚忍耐劳的作风，刺激着他追名逐利、光耀门楣的强烈欲望。同时对他日后长期的军旅生涯、居家治政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国藩曾经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说：“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由此可见，曾玉屏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都深深地影响着曾国藩。这一切不仅成为他当时发愤攻读、追逐名利的动力，而且成为他后来镇压人民革命生涯中坚韧精神和顽强意志的思想渊源。

二、读书与求仕

前面说过，曾国藩的祖上一直与功名、科第无缘，甚至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本来他祖父是有条件读书的，但由于他年青时放荡游惰，很早就弃学不上，所以文化程度不高。但后来他成了乡里的头面人物，遇事又喜欢跑在人前指手划脚，因而深深感到自己没有功名的缺憾。于是他决心让自己的儿孙上学读书，猎取功名，一方面是想补自己早年弃学的遗憾，另外一方面是想让儿孙通过读书跨入士绅的行列，并以此光耀门楣，荣宗耀祖。

但他的儿子曾麟书，即曾国藩的父亲读书却十分蠢笨，让这个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的老财主万分失望。据史料记载，曾麟书接连考了16次试都名落孙山，直到43岁那年才考取个秀才，仅仅比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曾麟书也深知自己与功名仕途无望，于是回家自办私塾，把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两代人的期许，光耀门楣的“重任”就压到了曾国藩他们的身上。

曾国藩自幼十分聪明，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悟性与求知欲。传说曾国藩出生时，他的曾祖父还在世。曾国藩降生时，他的曾祖父正好梦见有一条巨蟒从空盘旋而降，

盘于自家梁柱之间，巨蟒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令人不敢逼视。当这一切把老人从梦中惊醒时，恰好听传报说曾国藩出世了。因此全家人都觉得曾国藩将来会成为大人物，所以对他要求也特别严格。

由于家人的严格督导，曾国藩5岁就开始读书识字，6岁开始就在他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在此期间，曾国藩仅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五经》，随后学习八股文，为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在父亲严格的督导和“晨夕讲授，指画耳提”的教育下，曾国藩不仅仅学习四书、五经类文章，他还广泛涉猎了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周礼》、《仪礼》、《文选》等书，这些为他将来治学、从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曾国藩天资较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他自己的勤奋好学，他少年时候在家乡就小有名气。传说曾国藩14岁那年，他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欧阳沧溟到他们家做客，席间看到曾国藩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曾国藩的父亲也有意要卖弄一下自己儿子的才学，于是让欧阳沧溟当场出一个题目考考曾国藩。而曾国藩稍加思索便当场赋诗一首，欧阳沧溟看了后不禁连连点头，赞不绝口，认为这孩子小小年纪竟如此才思敏捷，长大后必然前途无量。于是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的正妻欧阳夫人。

跟着父亲读了8年书以后，曾国藩开始把目光放到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从20岁开始，曾国藩到外地求学，先是求学于衡阳唐氏家塾，然后又回到湘乡涟滨书院读书。十年寒窗苦读，这位志向远大、勤奋好学的书生终于在22岁那年中了秀才。秀才虽无功名之利，但这次成功无疑给曾国藩以巨

大的鼓舞，从此以后，他更加努力攻读，决心走那条封建社会中下层小地主的惟一出路：学而优则仕。

就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学习。岳麓书院在长沙城河西，背靠岳麓山，前瞰湘水，环境清幽秀美，是一处天地灵秀所钟之地。书院外有一条香径通往乾隆年间修建的爱晚亭，岳麓山上还保存着相传大禹治水时留下的碑石——禹王碑，长沙城东南又有着西汉长沙王刘发当年留下的遗迹。所有这些自然美景与诸多的历史遗迹都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刚从农家走出来的年青学子。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外面的世界是多么新奇啊！因此每逢阳光明媚天暖气晴的好日子，曾国藩常常或与学友结伴同游，共访美景，吟诗作赋，畅谈人生，或独自外出，怀古思今，陶冶性情，怡然自乐。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还心驰神往地写道：

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
妙高峰下携步谁？爱晚亭边醉几回？
夏后功名余片石，汉王钟鼓拨寒灰。
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少年书生对前途充满信心，意欲吞吐江山、挥洒才智的万丈豪情。

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的学习还是比较顺利的，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并且以他的诗文称著于老师和学友们中间，名噪一时。²⁴岁那年，曾国藩从岳麓书院毕业，并在这

一年他参加了乡试，高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然而事情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中举之后，曾国藩信心十足地打点行囊入京参加来年会试。他这次在京师滞留了两年，两次参加会试都以失败告终。也许上苍故意要“苦其心志”，就在他功名无望，远隔乡关的时候，曾国藩进京的身上所带的银钱已所剩不多。岁暮天寒之时，眼见别人功成名就，合家团圆，曾国藩不由得伤感凭添。想当年自己怀着巨大希望来到这天子脚下，皇城之中，本以为凭自己的学识才情必可金榜题名，荣归故里，现在才知道人外有人，功名之争，实非易事。有两首诗充分反映了他当时蹉跎岁月，虚掷光阴的苦闷：

(一)

韶华弹指总悠悠，
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
更无诗福住糟邱。

(二)

频年踪迹随波谲，
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子何日斫蛟鼉。

因此，第二次会考放榜不久，曾国藩顿生回家之念，再

加上囊中羞涩，他也不得不离开京都了。一路奔波劳苦，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辛苦自不必说。虽然路还是入京时的路，但曾国藩此时的心境却与入京时大相径庭了。来时豪情万丈，信心十足，如今却是落破还乡，凄凉旧道。但是，生性顽强，个性倔强的曾国藩并未就此气馁，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一定会如愿以偿的。因此，在路过金陵（南京）时，他不惜从老乡那儿借钱花重金买来廿三史，以便回家继续研读。回到家中，父亲看到盈箱累筐的书，再看看满脸尘土却又成熟不少的儿子，失望之余又颇感欣慰。他爱抚地看着曾国藩，意味深长地说道：“宽一（曾国藩的乳名），你借钱买书我并不怪你。你借的钱我会想办法替你偿还的，但愿你能好自为之，把买来的书仔细圈点一遍，也就算对得起我了。”曾国藩听了大受激励，从此闭门谢客，苦读一年，几乎足不出户，不时拿父亲的话来激励自己，并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从此之后，曾国藩养成了对诗文、史书的爱好，为他后来泛览百家，进行理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好为他以后带兵打仗，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作了极好的准备，方便了他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

一年苦读之后，曾国藩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终于，能耐青灯书案的曾国藩又一次打点行囊，告贷于亲族，第二次入京参加会考。在这次考试中，曾国藩终于时来运转，中了第三十八名贡士。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当时深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宰相穆彰阿。通过这次考试，曾国藩与这位炙手可热的朝中重臣搭上了师生之谊。

穆彰阿是满州镶蓝旗人，翰林出身，深受道光皇帝信用，

是鸦片战争期间有名的投降派。他最善于揣摩窥测道光皇帝的心思，进而对其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并且这人党同伐异，对政见、观点与自己一致的人就拉帮结派，反之则百般陷害，极力排挤。鸦片战争期间有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因为反对对外投降而被他陷害过。

自幼深受封建正统教育的曾国藩则对穆彰阿的投降主义政策大为赞赏，认为从国家千秋大局着想，对外应该行“和抚”政策，持“忠信”态度，妄图与英国政府讲妥，鸦片这东西不能作为正常的贸易品；对内则严惩那些私贩鸦片、吸食鸦片的官民，妄图以此作“釜底抽薪”，让鸦片在中国市场上自然消除。这种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但穆彰阿此时仿佛遇上知音，立刻将曾国藩视作是自己门生中最有才干，最有见识的人，从此对他格外器重，并立刻将曾国藩的名字由原来的“子城”改为“国藩”，取作国家藩篱之意。从此之后，曾国藩深感穆彰阿和朝廷的知遇之恩，一心一意做起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来。

参加完会考之后，曾国藩又参加了由道光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朝考，在穆彰阿的帮助下，他由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深造。这一年曾国藩 28 岁，入翰林院学习成了曾国藩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曾国藩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三、京师十二载

从 1840 年在翰林院做了京师七品官开始，到 1852 年回家奔母丧为止，曾国藩一直在京过着为宦生活。这期间他的生活又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在翰林院期间的理学研究和官居礼部侍郎期间革除弊政的尝试。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的地方，其主要职务是掌管朝廷制诰、文史修撰一类工作，不直接干预国家大事。初入选的庶吉士还要经过一系列考试才能被决定是升迁还是外放。因此，但凡希望攫取功名的人都不敢有丝毫放松，仍然抓紧时间读书，以应付朝廷的各种考试。

曾国藩年青时的功名心是很盛的。他的一位好友刘蓉说他是“锐意功名，意气自豪”，连他自己也承认当时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所以，这个常常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终有一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曾国藩是绝不肯虚掷光阴的。

但是，读书有读书之要，功名有功名之途，如何才能通过最便捷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有一次，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唐鉴，这唐鉴就是有名的镜海先生，与曾国藩有同乡之谊。在这次接见中，曾国藩

恰巧服侍在皇帝旁边。道光帝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有成就，并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道光帝对唐鉴的称赞，引起了曾国藩的深思：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视就必须投皇上所好，看来皇上看重的是德行的修养，是对义理之学的研究。几天之后，曾国藩就来到了唐鉴的住处，以弟子之礼拜见。年过花甲的唐鉴，早有耳闻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现在又见他如此谦卑，自投门下，于是就很乐意地收了这个门生。

在镜海先生的指导下，曾国藩从《朱子大全》入手，开始了他义理之学的研究，修身养性。

这样，义理的熏蒸和陶冶，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奠定了他今后的思想基础，曾国藩成了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

跟了唐鉴一段时间后，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苦、留意经济，学识渊博又不乏谋略的能臣。同样，唐鉴也看出曾国藩是个老成持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从此，他们师生之间往往是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多。

这样，曾国藩通过大量的阅读，精心研究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革命的经验，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学识，不仅为他当时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后来从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然而，就在曾国藩供职翰林院的几年中，国内外的局势也发生着急剧变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革命如火如荼。面对这一状况，一向急功近利，寻找机会报效君王的曾国藩再

也无心埋头治学读史，所以在官至礼部侍郎后，便开始在朝堂上陈述自己的政见，想对皇帝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并以此来挽救这个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封建大厦。

曾国藩对清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首先他拥护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仅是他那个阶级的利益代表，他所有的功名、富贵、前程都掌握在这个政府手中。无论是他个人的命运还是他家庭的兴衰都寄托在这个封建王朝身上。而且又由于深受封建理学的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宗法理学已成了他思想的支柱。因此，无论是从阶级立场，还是从个人感情角度出发，曾国藩都对这个没落的封建王朝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无限的效忠之念。在家信中他也多次表达了这种肝脑图报、尽心尽责的想法。其次他对清政府的现状又是不满的。作为地主阶级内部一个较有眼光和头脑的封建文人，曾国藩还是看到了清政府江河日下，军备松懈，吏治腐败的现状。他甚至认为道光末年到处造反的严重局面，都是由官吏的贪污腐败造成的。1851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这年春天广西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原因时说：“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结果，官逼民反，最后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曾国藩最为痛恨的。因此，他认为要想改变清政府软弱无能，岌岌可危的不利形势，使它变得坚强有力，能更好地统治人民，就必须针对其种种弊端进行一些改革。

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上书陈述用人之道，请求皇帝能够广开言路。咸丰皇帝上台后，为了收揽人心，稳定局势，

除了罢黜穆彰阿等人外，还下令征言，命令各大臣就“用人”和“行政”两方面各抒己见，封章密奏。曾国藩大喜过望，以为时机已到，连向皇上上书，痛陈改革弊政的重要性。但连上几次，都不见有什么动静，实际上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最后不得不作罢。

1852年7月，曾国藩奉命到江西做乡试主考官，并准备事完之后回家探亲。谁知还没到江西，忽然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讣告，于是立即调转方向，往湖南奔丧去了。一路辗转，回到故里。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乡居生活。

四、创办湘军

1. 墨经出山

1851 年 1 月 11 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省金田村爆发，他们创立了拜上帝教，藐视封建礼法，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是洪秀全。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自幼读书，成人后在一所私塾任教，起初，他也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由于屡试不中，激起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潦倒，地主阶级加紧剥削，各种社会现实终于让洪秀全觉醒过来。他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推翻旧王朝，建立一个新政权。为此，洪秀全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于 1843 年创立了“拜上帝会”，以此作为组织发展冯云山、洪仁谟等最早一批会员。随后，洪秀全回乡发展力量，冯云山则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进行传教活动，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一批革命领袖和骨干分子，会员群众达 2000 多人。

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攻城夺池，沿途吸收天地会的起义群众，声威大壮，很快由起义时一二万人发展到3万人。尤其在永安封王后，洪秀全为天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的领导体制逐渐形成，各条作战纪律陆续制定，作战经验也一天天丰富起来，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清政府立刻慌了手脚，连忙派钦差大臣前往前线督察军务。但前线将帅各怀鬼胎，矛盾重重，意见不一，不仅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与地方官员不和，就连当地文官和带兵将领也不和，所以他们之间相互掣肘，互不服气，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所以军事一再失利。最后清政府不得不对一批“钦差大臣”革职查办，就连咸丰皇帝的亲舅舅赛尚阿也不例外。太平军所攻占的各地驻军更是一触即溃，有的甚至望风而逃，根本不敢和太平军正面交锋。曾国藩来后大发感慨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而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清朝绿营兵的腐败难用暴露的更加明显了。

嘉庆末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清政府曾号召所在地方官举办团练，协助绿营兵追杀堵截起义人民，为清政府效犬马之劳。金田起义不久，江忠源率领的团练楚勇在蓑衣渡伏击战中大获全胜，使太平军兵力损耗一半，辎重给养全部丢弃，杰出的领导人才冯云山壮烈牺牲。这是太平军金田起义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另外，这支楚勇在保卫长沙时也做出

了重要贡献，有鉴于此，咸丰帝决定在各省仿照嘉庆朝办团练的成功之法组办团练，并首先在革命形势发展比较快的湖南举办。

这就是曾国藩奔丧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

当时曾国藩正在家中为母亲守制。根据封建礼俗，母丧儿应守制三年，否则就是不孝。由于曾国藩自幼便对母亲十分敬重，再加上母亲也对他格外疼爱，此时正因为没有能够见上母亲一面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间似乎觉得位列卿贰的尊贵，京都九市的繁华，官场尔虞我诈的倾轧，都如尘土烟灰一般，唯有这青山绿水、宁静和谐、骨肉至爱才值得珍惜。因此，曾国藩决心在家守制，度过这世外桃源般的三年生活，与父兄子女共享天伦之乐。

然而，就在曾国藩回乡不足半年的短短时间内，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平军不断北上，势力很快从广西发展到了湖南，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秩序，清政府在全省分别派驻了团练大臣，妄图在全省创办团练，协助地方驻军绿营兵尽快将这场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就在此时，在唐鉴的极力推荐下，再加上当时对咸丰帝很有影响的两位大臣恭亲王、肃顺的保举，咸丰帝下了一封诏谕：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团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这封上谕从北京送到曾国藩手上时犹如一颗石子投进曾国藩的心扉。拿着这封上谕，曾国藩反复看了几遍，心潮澎湃，起伏不安。说实话，无论是为皇上分忧，还是为实现个

人抱负，曾国藩都认为不应该推辞这个使命。十多年来，皇恩浩荡，不仅自己官居二品，而且整个曾氏家族都诰封三代，皇上的江山和他自身及整个曾氏家族都早已联成一体。现在皇上要臣下临危受命，他怎能辞而不受呢？何况早在家乡读书之时，他便立志此生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进了翰林院以后，更是不知多少次地面对历代的治乱兴衰感慨万千，对张良、陈平、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下决心今后一定也要入阁拜相，彪炳史册，留名后世。自从升任礼部侍郎以后，他便更加踌躇满志，国家大事，他件件都能应付自如。在兼管兵部时，他阅遍历代兵书，尤爱读《孙子兵法》和戚继光的《练兵纪实》、《纪效新书》。眼看长毛作乱，时局动荡，危及两湖，看来还有蔓延开去的危险，被朝廷视作心腹之患。这不正是自己报效皇上，为君分忧的时机吗？何况自己也恨死了那帮作践孔孟礼仪，犯上作乱的逆臣贼子。还是应命出山吧！

蓦然间，曾国藩又下意识地摇摇头，想起咸丰帝初年自己改革吏治的失败，冒死上书的后果，新皇天子的圣德实是不敢深领。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使曾国藩深深懂得，当今为官，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贵族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办团练，性质更加不同。团练若不能打仗，则不成事，不成事则皇上众朝臣看不起。若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兵权的汉人一向猜忌很深，这只军队将会招致多少猜疑！天威莫测啊！弄不好，不但自己徒劳无功，还会身遭不测。再说湖南的吏治也太腐败了，在十八省中可谓首屈一指，自己和这样的人共事，成功的希望

有多大呢？另外还有一个深埋在曾国藩心底，不敢有丝毫表露的原因，那就是这次出京南回奔丧，一路上所见之处都是哀鸿遍野、饿殍盈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各种情况都表明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大厦将倾。洪秀全、杨秀清的军队又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实在是不好对付，自己一介书生，从未带兵打过仗，能担此重任吗？

除了这些疑虑外，还有一点也是促使曾国藩举棋难定的原因之一，那就是他早就扬言要克尽子孝，为母守制三年，绝不出山。现在倘若尽毁前言，又怕别人看出他实际的野心，为天下人所耻笑。

但没过几天，武昌又被太平军攻下，曾国藩意识到照此下去，自己家乡迟早也是太平军的领地。终于，经过几多犹豫，曾国藩在老朋友郭嵩焘的劝说和父亲的鼓动下，以保卫家乡为旗号，领皇上圣命，墨经出山了！

2. 初办团练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和郭嵩焘一起从家乡动身前往长沙。路经浏乡县城时，又特意会见了罗泽南、刘蓉、王鑫等人。这些人也刚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征调1000人赴省守卫的命令，便与曾国藩同行。后来，这帮人也就成了曾国藩办理团练、训练湘军的最初班底。

一到长沙之后，曾国藩就对张亮基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作法。首先他向张亮基提出“乱世须用重典”，即对官场应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加镇压，做到“宁可失之于严，不

可失之于宽”；其次他又提出要在省城建立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优选择，将优者募来省城，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乱匪。对于这些，张亮基都深表赞同。于是，在征得咸丰帝的同意后，曾国藩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 1000 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 800，这些团丁分为两营，每营 360 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鑫带一营。几个月之内，湖南调至长沙的各路兵勇达数千人。从此，曾国藩仿照明朝戚继光的做法，对招募来的兵勇严加训练。

办起这个“大团”，曾国藩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的，清政府虽然任命曾国藩，曾国藩虽然身为团练大臣，但实际上清政府并不指望团练武装能在镇压太平军中起什么作用。因此咸丰皇帝给他的命令只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并没有让他募勇练兵，建立军队。但曾国藩的想法却不一样。团练毕竟是团练，一来人数少，力量单薄，只能协同绿营兵作战，对付小股反抗的农民，如果用它来抵抗有严密组织、指挥统一作战灵活的太平军则无异于螳螂挡车，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太远。二来团练太不容易办：首先令人感到头痛的是经费问题。在当时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绿营的军饷且尚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分出一部分来供应给团练了，因此，团练所需经费都必须由地方士绅自筹，与官府无涉；其次团练过于分散，自己不好统一指挥调度，更加难于管理，自己虽为团练大臣，却也鞭长莫及，弄不好团练没办成，倒会因为用人不当等问题激起劳动人民更大的反抗，引火烧身，加速灭亡。更别说实

现目的愿望，曾国藩很想把各地的团练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团”，集中训练，统一管理，而实际上就是建立一支军纪严明，有较强战斗力的不同于八旗、绿营的新军队。他的最初想法就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挡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这样立即就可以形成一支劲旅，拉到外面去与太平军抗衡。同时，自己身家的兴旺，也全部寄托在这支军队上。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政府历来对掌握兵权的汉人猜忌很重，所以曾国藩不得不仍打着团练的旗号，把自己的真实意图纳入其中，以求名正言顺地得到咸丰皇帝的支持。

曾国藩初到长沙时，虽然太平军已经北上，但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四处燃烧。湖南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在练兵的同时，还不忘严厉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求迅速恢复和稳定被太平军打乱的封建社会秩序。

1853年旧历二月，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率众起义，自称南普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等。曾国藩迅速派刘长佑、李辅朝、王鑫等率领湘勇前去镇压。1853年旧历三月，衡阳刘积厚于草市起义，曾国藩派罗泽南前去镇压；永兴、安仁、茶陵等地农民起义，曾国藩均派湘勇镇压。

四月，安化串子会起义，曾国藩委令湘乡知县朱诒孙率兵攻打；江西上犹农民起义军进入湖南，攻克桂东县，曾国藩令张荣组率兵镇压。

不仅如此，曾国藩又在长沙城设立了审案局，对于那些

危害社会治安，有损封建统治秩序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他规定：不管是会匪、游匪、土匪、盗贼或是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决不姑息手软。另外，为了鼓励团丁，他又规定凡捉一匪，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们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来几个。为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还命人制做了十个木笼，取名为站笼。站笼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行，夜晚则放在露天地，派兵守住，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中。这笼子每天都装着犯人在长沙城内游街，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怵，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一时间，“曾屠户”、“曾剃头”的名号也在长沙城内四处传开。

由于使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凡是被捉之人送到审案局后，无不“就地正法”。这样，曾国藩的审案局就成了阎王殿，凡进去的人都休想活着出来。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至1853年7月，仅短短四个月时间内，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就地正法的104名，“立毙杖下”的2名，“监毙狱中”的31名。其他曾国藩命令各县就地处死和后来捕捉的串子会群众92名还不算在其中。他自己后来承认杀了200多人，但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曾国藩的残酷镇压下，各地已经发动起来的起义尽被扑灭，正在酝酿的起义也销声匿迹，对官府、劣绅深怀不满的劳动人民也不敢稍有怨言。因此，湖南一省被冲乱的封建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地主官绅又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广大城乡的统治。

3. 移居衡州

当曾国藩把大团的勇丁整顿好之后，便下令每天都进行军事训练，还规定逢三、八两日进行政治训练，主要是听曾国藩的训话，训话的主要内容是纪律教育和为人处世之道。

按照清朝常规，各省的绿营兵受总督、巡抚管辖，文官除兼有提督的头衔外，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抚标营以外营兵操练事务。湖南省设了提督，按理绿营兵的操练该由提督鲍起豹负责，巡抚都无权过问。曾国藩以一个帮办团练大臣的身份，就更无权干涉营兵事务。但他却毫不避嫌，很快地就通过练营兵中一个小军官塔齐布，把手伸向了绿营兵。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曾国藩刚到长沙办大团时，因为训练勇丁没有教官，便向绿营兵中聘请了三位教师，塔齐布为其中之一。塔齐布强悍骁健，没有一般旗人和绿营兵的恶习，训练出力，听从号令，因此很受曾国藩的赏识。

从1853年5月起，曾国藩通过塔齐布传令绿营兵与勇丁会操，并与勇丁一起听取政治训话，虽然当时正值盛夏，也从不间断。

就这样，时间一长，麻烦事就来了。那些绿营兵平时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回操练。即使去操练的日子，也都是随便比划几下，走走步伐，舞弄舞弄刀枪就算完事。更有甚者花钱雇个人代替，自己则睡觉、下馆子、逛妓院。三伏天、三九天是照例不操练的。就这样的士兵怎能受得了曾国藩的严格训练？一般来说，大团的训练每天都要在8个小

时以上，事事都讲认真过硬，不允许有丝毫马虎。曾国藩本人也每天都要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得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到操场集合，一天下来，骨子架都要散掉了。不仅如此，还要听曾国藩训话，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精忠报国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于是这帮绿营兵纷纷把曾国藩的会操训话看作是对他们极大的污辱，都寻找借口不去上操。

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要数长沙协副将清德。他一面拒绝会操，一面煽动手下兵将们指责塔齐布巴结曾国藩，孤立塔齐布。曾国藩对他这种做法极为痛恨，打算从清德入手，寻找机会参他一本，将其革职查办，树立自己在湖南官场中的威信。

机会终于来了。六月初八是清德一个爱妾的生日。清德打算好好热闹一下以讨这位姨太太的欢心。于是早在9天前就大发请柬，还命令50余名士兵为他办酒席服务。恰好这天是初八会操的日子。这样一来，那些绿营军士们都有了好理由，纷纷谎称病假不去上操。曾国藩巡视时看到那么少的人，弄清原委之后，大发雷霆，决心对那些旷操的士兵大加惩罚，并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和去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清德“摘去顶戴，藏匿民房”为由，请咸丰皇帝降旨将清德革职后交刑部从重治罪，同时，又保举塔齐布任副将一职。

曾国藩参劾清德、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耳中，他又急又恨，急跑到提督鲍起豹那里诉冤告状，并挑唆鲍起豹说长沙居民现在只知有团练大臣曾国藩，而不知有提督鲍起

豹，还反控曾国藩六月训兵是虐待士卒，塔齐布听从曾国藩号令，与团勇会操是目无军纪，破坏营制，鲍起豹本来就是一介武夫的粗人，对文官和团勇向来就非常瞧不起，现在听说曾国藩竟然不征求他的同意就敢参劾自己副将，于是立即下令说盛夏操练士兵实为虐待士兵，有谁胆敢违令参加操练的，军棍伺候，决不轻饶。从这以后，不仅绿营士兵不再前来会操，就连塔齐布也不敢再来了。

湖南各官员本来就对曾国藩的残忍凶暴有意见，再加上他又爱管闲事，不该他管的事随便插手，犯了官场大忌，所以大小官员们对曾国藩无不心怀不满。现在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暗暗得意，拍手称快。在这种气氛下，绿营兵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长沙团勇无故遭到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击。

曾国藩为此窝了一肚子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强忍下去。

但事过不久，曾国藩又被一场更大的烦恼折磨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七月中旬，鲍起豹的几个提标兵因为喝酒赌博打架，恰逢塔齐布和几个团勇在旁。他们看不过去，就去训斥了几句，提标兵不服气，最后终于导致了一场械斗。那几个挨打的提标兵回去之后，立刻纠集了一大帮人，气势汹汹地找曾国藩，要他交出打人的凶手，曾国藩气愤不过，决心杀一儆百，整整绿营兵这种勇于私斗、怯于战阵的歪风。于是写信给鲍起豹，要他交出肇事者，严格军纪，惩前毖后，对这些人以军法严加惩治。鲍起豹非常气愤，借机故意大肆张

扬，有意叫曾国藩下不了台，于是公然将肇事者捆送曾国藩公馆。

一向骄横无礼，从不把团丁和曾国藩放在眼中的绿营兵本来认为鲍提督会让团丁来向他们赔礼道歉，现在想不到将他们的兄弟捆了起来，送交曾国藩处置。于是一群无法无天的绿营兵感到像是蒙受了奇耻大辱，吹号集合，气势汹汹，扬言要杀掉塔齐布和曾国藩。随后一群人先冲向塔齐布的住处，把塔齐布房间里的全部东西都砸了个稀巴烂。塔齐布幸亏见机得快，事先躲到了屋后面的草丛中，才免于一死。接着，当晚这些人又冲进曾国藩的公馆，用枪打伤曾国藩的一个亲兵，几乎又将曾国藩击中。曾国藩狼狈万分，只得派人向湖南新巡府骆秉章求援。骆秉章与曾国藩的公馆其实只有一墙之隔，这么大的动静他不会不知道，但近在咫尺的这位湖南巡抚却装聋作哑，静观事态发展。直到曾国藩派人前去打门，才故作惊讶，出来解围。而骆秉章来了之后，却立即给肇事者亲自松绑，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于在一旁受尽惊吓的曾国藩没有一句安慰的话。更令曾国藩难堪的事，整个湖南大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同情他，反而都纷纷指责他不应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分明是他咎由自取，活该受辱。

曾国藩一时气愤填膺，满肚子苦水无处倒，仿佛有四面楚歌之感。就在心中的怒涛平息之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以后的出路问题。他想自己这几个月以来忍辱负重，自己的所做所为也只限于平息了几场小的动乱，这与自己建曾家军、与长毛一决雌雄的目标相差实在太远。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官场和绿营兵始终不会看得起自己，而自己一生入阁拜相的

理想也只能成为空想。几个月以来，颇有心机的曾国藩是看透了，长沙不是个能成就大事业的地方。这里官场暮气太重，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且什么事都干不了。不仅如此，他们更不容许别人去干，如果有谁出风头，他们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弄得你最后也一事无成方肯罢休。这里简直就是一群乌鸦汇集之地，只有当你浑身变得和他们一样黑的时候，才不会听到前后左右的聒噪声。在这里且不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了，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我们一起烂掉。

曾国藩越来越清楚地感到：长沙城自己再也呆不下去了，自己要想大展鸿图，就必须离开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地，离开那些妒才忌能的庸碌之辈。

1853年9月，曾国藩借口湖南南部形势不稳，必须自己亲自带兵坐镇，于是带着1000多号团丁，驻扎在南岳衡山的南麓衡州城。

4. 编练成军

对曾国藩本人来说，他对衡州是怀着很深感情的。这是因为一来他祖籍衡州（即衡阳），二来他的妻子欧阳夫人是衡州人，还有他少年时跟着父亲学习八年之后，曾在衡州跟着伍觉庵先生学习。因此，到了衡州之后，曾国藩如鱼得水，如虎归山，一改长沙城中倍受压抑的郁闷心态，决心在这里大展身手，放开手脚练勇、建军。

湘军分水陆两部：陆师的建立从1853年初就开始了，曾

国藩刚到长沙城中不久，从各县募来的团丁就是以后湘军陆师的雏形。曾国藩被迫移驻衡州后，把这批人也带了过去，为创立湘军打下基础。

1853年夏天时，曾国藩曾经和他的学生江忠源商量要建立一支万人的兵勇，作为以后镇压太平军的资本，但后为考虑到要建水军，所以又将陆师的规模缩小到5000人。其基本单位是营，一师十营，每营500人，由塔齐布、罗泽南、王鑫等人为营官。终于，这支5000余人的陆师初具规模。

曾国藩在加紧训练陆师的同时，重点开始了湘军水师的筹建工作，企图以它与太平军强大的水师抗衡。

太平水师组建于1852年12月，12月初太平军攻下湖南益阳后，征集民舟3000艘，不久占领岳州后，又获得民舟5000余艘，累计舟船8000余艘。杨秀清将多数船工水手编入太平军，任命唐子财为水师将军。太平军水师正式宣告诞生。12月中旬，太平军沿江北上，连克汉阳、汉口后，用万余艘船只横陈江面上，当作浮桥，从汉阳直达省城武昌。水陆并进，一举攻克武昌。1853年2月，洪秀全统领大军，万船齐发，水陆并进，一路蔽江而东，帆樯如雪，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并于3月20日一举攻下江宁（今南京），改名为天京。从此，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与清王朝的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太平军更以安庆、九江为重要军事据点，利用拥有的万艘战船，完全控制着江面。

面对这种情况，清军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与太平军水师相抗衡，想剿灭太平天国的计划只能是幻想。

对于这一点，江忠源看得最透彻。他在江西行军务时，上

书咸丰皇帝要尽快建一只水师与太平军抗衡，并同时写信给曾国藩，建议他在衡州期间筹建水师。皇帝对江忠源的这个建议很重视，于是两次命令两湖、四川制造战船。

接到皇帝的上谕后，曾国藩很是兴奋，立即着手组建湘军水师事宜。但万事开头难，湘军水师组建之初，曾国藩手中是既无资金，又无人才，甚至连适合造船的木材也找不到，只好购买钓钩、小舢之类的民船，然后对这些民船拆拆装装，改头换面一翻，暂时充作炮船。

由于湖南人无人懂得炮船船式，工匠又不会造船技术，因此曾国藩在造船过程中大费周折：他首先在衡州设立了一个造船总厂，随后又在湘潭设了一个分厂，从外省请来工匠监督造船。所造的船只有两种：一种是船身巨大，行动笨拙缓慢的长龙、快蟹，一种是机动灵活、行动迅速的小舢板。曾国藩在部属黄冕的劝说下，接受了他以长龙、快蟹补小舢板沉稳不足、以小舢板补长龙、快蟹灵活欠佳的缺点，这样，二者配合使用，相得益彰，形成了清军水师的最大优点。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配合虽然天衣无缝，但若将这大小战船分开以后，就都失去了作用。这叫做“合则双美，分则俱败”。因此，也正因为湘军水师有了这个致命弱点，后来才会导致了它的全军覆没。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曾国藩在解决了船的问题之后，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中国各省制造的大炮，炮身笨重，射程又近，即使是二三千斤的重炮也不如洋人数百斤的轻炮射程远。曾国藩深深知道，纵然是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火药，但中国现在的制炮技术比洋人还是要差上远远一截。想在战船上配制好炮，目前还

只能买洋人的。因此，曾国藩不惜重金，派人从广东购买大批洋炮。在此基础上，曾国藩组织了大量人力，网罗一批中国近代有名的科学家，让他们对洋炮反复研究，多次试验，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1854年2月，湘军船炮齐备，共计大小船只361号，其中托罟大船1号，长龙船50号，快蟹船40号，舢板150号，用钓钩船改造而成的战船120号。同时，在船上装备大小炮470门，其中新购洋炮320门，从广西借来150门。到此为止，曾国藩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湘军水师的营制与陆师大体相同，5000人共分10营，每营500人，营官分别由彭玉麟、杨载福、褚汝航等10人担任。

在招募水师兵勇的时候，曾国藩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本来衡阳一带人因为靠近湘水，所以习水性的人很多，但曾国藩却因为这里会党势力太大而不愿在这里招募兵勇，他害怕被会党群众混入，影响他军队的战斗性。所以他的5000水师仍大多数从其家乡湘乡招募而来。然而湘乡人又大多不习水性，而且当时他的水师营官除褚汝航、成名标外也都不懂水战，其训练水师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经过一番努力搞起了内河水师，而且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大大超过了太平军。这也正是曾国藩得意的地方。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与艰苦训练，这支由曾国藩忍辱负重、费尽心思建立起来的水陆两师，1万余人，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军队。曾国藩赖以发家的资本终于建成了。

五、困守江西

1. 靖港惨败

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大获全胜，将清军兵营11座全部烧毁，曾国藩的会试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水而死。咸丰皇帝得报以后，立即下诏命令曾国藩带领炮船兵勇，进行“东征”。

接到皇帝的命令，看着面前一群群摩拳擦掌，急于参战的水陆各路人马，在出发的前夜，曾国藩的心激动了。

是的，曾国藩有千百条理由激动的。从少年到青年直到中年，一种渴望建大功立大业，做非常之人的理想，就一直贯穿他的人生。但过去，这种理想只限于纸上流露，虽然近年来自己一直官运亨通，但终究没有什么大功勋。今天，经过一年多来忍辱负重、呕心沥血的筹建、训练，他的手中已经有了一支水陆两路，20余营1万多人的湘勇了。而他自己——曾国藩正是这支人马名符其实的统帅。这支戎装待发的军队，只等他一声令下，水陆并进，旌旗蔽日，战舰如云，浩浩荡荡，直捣敌巢。今后，他将亲自指挥这支人马，歼灭长

毛，收复失地，成就郭子仪、诸葛亮的事业。30 年来的理想，眼看就要成为现实，这个从白杨坪走出，没有祖业和靠山、全凭自己努力奋斗的农家子弟，心情是何等的感慨万端！自己一年来忍气吞声的痛苦，终于要随着自己以后叱咤疆场的岁月成为过去，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比起即将到手的荣誉和成功，过去的挨骂受制算得了什么！他要向世人展示：曾国藩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平静的、有意义的夜晚！

1854 年 2 月 25 日，曾国藩带着满心升官发财的梦想，率领这支苦心经营的队伍，威风凛凛、踌躇满志地从衡州出发，挥师北上。沿途之中，到处张发《讨粤匪檄》，檄文中大骂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号召一切“读书明理”之人起来捍卫孔教、保卫圣道，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把湘军从衡州开到长沙，还没来得及发动“东征”，太平天国的西征军石祥贞就率部占领岳州等城，前锋直逼长沙。石祥贞是翼王石达开的亲弟弟，年青有为，是太平军中一位杰出的青年将领，他手下的将士，勇敢忠诚，能征善战，是一支真正的雄师。

在长沙城休息两天后，曾国藩便率领水陆两路军马向岳州进发。石祥贞见敌人来势汹汹，决心让其锋芒，退出岳州城，然后在湘鄂交界处，地势十分险要的羊楼司打个伏击战。

在向岳州城开进的途中，曾国藩听探马来报，说岳州城的 3 万长毛卷旗而退。曾国藩一行未动一刀一枪就轻易地收

复了岳州，真是旗开得胜，全体湘勇包括曾国藩在内无不兴高采烈。

第二天清晨，曾国藩决定派先锋王鑫、李续宾带领 1000 号勇丁，从岳州向武昌开进。这行先锋队伍一连行了两天路，都未见长毛一兵一卒。因此，他们越发高兴，必定是长毛害怕了，见他们望风而逃。深夜，当他们宿营羊楼司时，连夜间巡逻的人都没派一个，勇丁们个个呼呼大睡。半夜时分，太平军将领率着数千兵士从四周山里冲出，高举灯笼火把，持枪拿刀，呐喊着向羊楼司湘军驻地冲来。这一群仿佛从天而降的士兵把湘军搅蒙了，他们纷纷从酣睡中被惊醒，惊慌之间又没有灯火，许多人甚至连衣裤都摸不到。王鑫、李续宾不敢恋战，慌忙率领残兵败将南逃，退守岳州，太平军将岳州城团团围住。曾国藩一见之下，大惊失色，本想扔下王鑫不管，自己迅速退兵，怕自己也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但后来在幕僚的劝说下，才打起精神，派水师炮船到岳州城外虚张声势，连放数炮，王鑫等人趁机弃城逃出，会同曾国藩，慌忙之中登上战船，垂头丧气地往长沙奔去，一路狂奔，直到过了湘阴以后才喘过气来。

太平军乘胜追击，再次占领靖港、湘潭等城市，形成对长沙的钳形攻势。曾国藩快逃到长沙城时，不好意思进城，就把水陆军驻扎在城外。由于曾国藩出师不利，湖南官绅纷纷议论，大骂曾无用，有的甚至要解散湘军。

这一战使湘军死散 500 余人，小头领也死了十几名。再加上各官员的讥笑谩骂，曾国藩气恼万分，但他并不灰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虚骄轻敌，冒进

贪功。于是，曾国藩不理城中的闲言碎语，决心下次再与长毛决个雌雄。

太平军占领湘潭后，曾国藩立刻派杨载福、彭玉麟率领五营水师前去收复。因为出师不利，离开长沙就吃了败仗，曾国藩的湘军在朝廷和湖南官场丢了大脸，因此曾国藩急于想在收复湘潭这一城池中立功，挽回点面子。就在收复湘潭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曾国藩忽然接到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那里太平军少而无备，如果前去突然袭击定能成功。曾国藩犹豫了半天，弄不清这消息是真是假，自己该去还是不该去。然而曾国藩太需要打胜仗了。几经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多带兵勇，突袭靖港，杀他个措手不及。一来可以雪上次兵败之耻，二来也可以打个胜仗，在官场中扬眉吐气一番。经过一番周密的战前准备，曾国藩带着收复湘潭所剩的全部人马，亲自指挥，杀气腾腾地向靖港开去。

曾国藩将军队开到靖港一看，城内杳无一人，正自疑惑的时候，忽听得一声冲天炮响，埋伏在四周山上的2万太平军将士一齐钻了出来，一个个高举大刀长矛，呐喊着冲下山来，像一股不可抑制的洪水，压向靖港。曾国藩看着满山遍野的太平军，方才明白上了太平军的当了，心中叫苦不迭，连连顿足。曾国藩带来的这帮湘勇，只知道靖港城内长毛很少，大多都是满怀轻易取胜的把握而来的，眼前忽然出现的这种惊天动地的场面，完全没有料到过。于是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尚未交手，先已气馁腿软。王鑫、李续宾等人只得强打精神，压住阵脚，指挥湘勇迎敌。但刚一接上火，湘军便纷纷败下阵来，争相逃命。靖港镇上，到处响起“活捉清妖曾国藩”的

吼声，太平军个个奋勇，杀得湘军溃不成军，不知往何处奔逃，最后退到江边。看到这种情况，曾国藩又气又急，无计可施。眼看一群群湘勇抱头鼠窜，没命般地逃到江边，他怒火中烧，慌忙抽出随身携带的宝剑，离船上岸，又命人在江边树一面军旗，亲自仗剑立于旗下，声嘶力竭地大喊：“有过此旗者，立斩无赦！”

然而两军对垒，兵败如山倒堤崩，人人都逃命要紧，谁还管你统帅威严？这群湘勇都绕过旗子狂奔，无人理会曾国藩的威逼谩骂。曾国藩看着如海潮一般压来的太平军，又看看全部乱了套的、争先恐后逃命的湘军，惟有摇头叹息。最后只得收拾残兵败将，在幕僚部将的劝拉下，弃岸登船，丢盔弃甲，仓惶向长沙奔去。

对于绿营兵的望风逃溃，曾国藩曾一再讥笑，不料自己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期望建不世之功的湘勇竟也是如此不堪一击，临阵而退！自衡州出师以来，自己与长毛两战均以失败告终，曾国藩心灰至极。再想想皇上的重托、恩师的信任、父亲的教诲、自己的抱负，眼见都要化为泡影。自己出征前的大话，也将永远成为同僚和后世子孙们的笑柄。想到这里，曾国藩羞得无地自容。更加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回去之后要面对多少张幸灾乐祸、不怀好意的面孔。还有，如何面对湘乡的父老乡亲？想到这里，曾国藩顿生死念。瞅准身旁的亲兵不在意，曾国藩推开舱门，咬牙纵身往水里一跳，就让这美丽多情的江水把自己吞噬吧！

见到曾国藩跳水自杀，众人慌忙将他救起，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进船舱，耐心劝慰。回到长沙兵营以后，由于不堪忍

受大小官员的冷落和白眼，曾国藩也自忖靖港惨败一役，身为将帅，难逃其咎。现在湘勇在湖南名声狼藉，自己多年的辛苦付水东流，万一皇上怪罪下来，自己仍是吃罪不起。于是几次想自杀，但都被及时阻拦住。据说他当时连遗书、遗折都已拟好，还命令他的弟弟曾国葆为他买来一副棺材，以备己用。这样灰心丧气地过了好长时间，直到湘潭水陆大胜的消息传来之后，曾国藩才振作起来。

在此期间，曾国藩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湘潭这三次战斗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手下兵将万人之多，但遇太平军后仍然是一触即溃。在岳州战役中，敢于和太平军作战的只有杨载福一营，在靖港之战中，敢于作战的也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因此，兵贵精而不贵多。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曾国藩开始对湘军进行大力裁减，凡是在作战中溃逃的兵营，立即进行裁撤，所有勇丁、营官一律不用。经过这番整顿之后，湘军水陆两师仅剩 5000 人。在这次裁军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据说曾国葆回家后，自己感觉无脸见人，好几年中都闭门谢客，深居不出。

经过这次裁军整顿，湘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军纪严明，不徇私情的做法也使大部分湘军将士心服口服。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湘军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想追随曾国藩升官发财的人，都必须为他卖命出力，不允许有任何人滥竽充数，冒功冒饷。这样一来，湘军就同那些溃了又集，集了又溃的绿营兵完全区别开来，战斗力、凝聚力都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由于前两次败北，湘潭一役虽然获胜，但湘军损失也很大，又经过大规模裁军，湘军无论在人数还是在

武器装备上都不足以再与太平军抗衡。因此，奉皇帝之命，曾国藩又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湘潭、衡州两厂重造战船 60 余艘，修整战船 100 多艘，裁军的同时又招募了一批勇丁，准备重整旗鼓，以雪前耻。

最令曾国藩兴奋的是，咸丰皇帝以株守长沙，不主动迎敌的罪名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实际上把这一职权授给塔齐布。这无疑是给了曾国藩莫大支持，从此，曾国藩在湖南士绅官员中完全站稳了脚跟。

2. 攻战武昌

湘潭失守以后，太平军也迅速重新调整了战略布局。原来守战湘潭的将领林绍璋经靖港、岳州迅速撤到常德一带，向正在西进的曾天养部靠拢。曾天养听到湘潭失利的消息后，也立即南下，两军汇合一起回到岳州，在那里筑垒挖濠，修筑工事，准备迎接湘军的进攻。

在长沙经过一番休整，湘军战斗力提高了，元气基本恢复。这时太平军在湖北省势力发展很快，沿江军事重镇武昌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岌岌可危，曾国藩急忙奉皇帝的命令由湖南开赴湖北，协助那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援救武昌。

1854 年 7 月上旬，曾国藩率领整顿后的水陆大军从长沙出发，准备攻取岳州，经洞庭湖进入湖北。这次曾国藩带的军队除了湘军本身扩充外，还有胡林翼带的 2000 兵勇和陈辉龙带来的 650 名广勇以及李孟群带的广西水勇 1000 人。在曾国藩将要出兵时，武昌城被太平军攻下。

7月16日，塔齐布率领部下7000人占领新墙，前锋直逼岳州城。罗泽南、周凤山率领数千人做为后援部队。7月24日，太平军迎战失利，曾天养率领部下连夜退守城陵矶要塞。城陵矶在岳州东北15里处，扼洞庭湖口，地势十分险要，是由湖南进攻武昌的必经之地。

8月9日，曾国藩的水师将领陈辉龙、沙镇邦、褚汝航、夏銮四人不顾水军大忌，乘风顺水，率部飞舟直奔城陵矶下，正好落入太平军早已设好的埋伏圈内。结果全军覆没，只帆未返，四人也落水而死。这次战役，湘军水师损失又近一半，曾国藩闻报后“伤心陨涕”。

太平军水战取胜后，曾天养于8月11日率兵登陆，准备扎营结寨，凭借险要地势据守于此。曾国藩见到这种情况，急忙令塔齐布从陆路进攻。曾天养仓猝迎战。塔齐布是曾国藩手下最为得力的一员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战，仍保留着旗人入关时的那种强悍气质。这一战是短兵相接，打得异常激烈。曾天养在马上发现塔齐布后，想擒贼先擒王，大叫一声，便单身匹马冲进敌阵，挺枪直取塔齐布。但由于敌人人多势众，曾天养的坐骑不幸被塔齐布刺中，自己也落马堕入敌营，虽然又刺死敌兵数名，但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曾天养一死，太平军立刻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顿时，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心与湘军争锋，只好向武昌退去。

这一战之后，湘军水陆并进，挥师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反抗，气焰逐渐嚣张起来，简直不可一世。据说当时这种情况以水师为最。过去的战船周围一般都用牛皮

等物围上，用以防对方的箭矢、枪弹等，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但由于湘军打了几次胜仗，便目空一切，非常狂妄，于是他们都扯去防御用的牛皮等物，赤膊裸胸，站在船头，无所顾忌，仿佛亡命徒似的，其凶狠、强悍、好战远远强于绿营兵。曾国藩后来回忆起这段情景时，曾经不无得意地记述过这件事。湘军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指挥，从岳州出发，经过羊楼司、崇阳、咸宁、金口一路直抵洪山、花园一带。

花园、洪山一带是武昌城的天然屏障，太平军在这两处都设有重兵防守。而要想拿下武昌，就必须先通过这两个地方。

当水师走到金口时，曾国藩便下令停止前进。这时，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陆路人马也恰好抵达金口。曾国藩召集湘军水陆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城之策。罗泽南建议兵分两路，一路由塔齐布带领进攻洪山；另一路由自己带领围攻花园，防止那里的太平军分兵从后路包抄塔齐布一师。曾国藩采纳了这个方案。

1854年10月12日，湘军从金口出发，当天就摧毁了太平军的花园、洪山防线。第二天进至鲇鱼套，并将武昌城附近的所有营垒焚毁殆尽，这样，武昌重镇就完全暴露在湘军的包围之中。

而负责守卫武昌城的太平军将领黄再兴、石凤魁等人，要么是文官；要么是洪秀全的皇亲国戚，都不懂带兵打仗。眼看湘军两万人马气势汹汹地兵临城下，立刻丧失信心，惊慌失措，连夜带领亲信人马匆匆逃到田家镇。合称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便也弃城逃溃。这样，武汉这

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军事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敌人。更为可恨的是，这群败类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水中的大批水师。武昌、汉阳失守以后，这些水军就被完全封锁在汉水中，遭到了彻底毁灭。就是守城的士兵也有一大批没有来得及撤走，他们大多都被湘军当场杀害或赶到湖水中淹死了。

这样，太平军经营多年的水师毁于一旦，一年多西征的成果也被葬送掉了一半。

占领武昌城后，湘军充分暴露了他们残忍、暴虐、嗜杀的特点，曾国藩也把他“曾剃头”、“曾屠户”的名号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天他便亲自下令，对敢于反抗的太平军和居民一律剜目凌迟，而罗宗南甚至诱迫和怂恿他的部下士兵生吃被俘太平军的血肉心肝，武昌城内一时成了阎王的地狱。

当时，咸丰皇帝正被太平军搅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不料湘军竟能异军突起，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拿下武汉这个军事重镇，消息传到北京时，他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10月26日，当曾国藩的捷报送至咸丰帝的龙书案前时，这位饱受太平天国困扰的天子欣喜异常。龙颜大悦之后，立刻下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第二天，他还眉飞色舞、兴冲冲地对军机大臣祁隽藻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祁隽藻听后，小心翼翼地进言道：“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咸丰听了这番话后，立刻像被提醒了似的，很快从兴奋中清醒过来，沉吟良久，想起汉人掌握兵权，如果再让他拥有地方实权，将来自己实在不好驾驭，弄不好还会像当年康

熙年间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一样，为番作乱。于是严奉祖训，另下一道圣旨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的头衔，办理军务。在以后的六七年间，也一直都是让曾国藩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始终不肯授予他地方实权。

更为可笑的是在接到皇上赏给“署理巡抚”职务的圣旨时，曾国藩曾高兴万分，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掌握地方行政实权，行兵募饷不再受地方官员的掣肘。但自己是墨经出山，尚有母孝在身，如果自己毫不谦让地接受了这个职务，怕遭别人耻笑，于是还假意推辞一番，说攻克武昌都是部下的功劳，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功绩，接受这一职位实在内心有愧。另外母丧未过，自己如果远就官职，恐怕会“外得罪于名政，内见讥于宗族”。因此，请皇上收回成命。然而，曾国藩的这一辞谢奏疏还没送到北京，大梦初醒的咸丰帝就已改变了主意，收回成命。接着，咸丰又倒打一耙，说曾国藩在上奏时官衔后面没有署上“巡抚”，有违旨之罪，要对他“严行申饬”。

曾国藩辛辛苦苦攻占武昌，还不如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和署理湖北都督杨霨，他们都得到重赏，而自己在受了一番嘲弄之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抗旨不遵的罪名，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一桩往事又涌上他的心头……

在自己由衡州出兵之初，由于湘军粮饷缺乏，朝廷又不给银钱，只有自己想办法筹借，向当地几个有名的大官绅发出倡议书，希望它们能捐出一部分钱来，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衡州城首富杨江向曾国藩提出条件，自己可以捐银2万两，但曾国藩必须代他向皇上奏明，允许为他的祖父在原籍建乡贤祠，并允诺事成之后再向湘军捐5万两银子。

杨江的祖父杨健是衡阳人，嘉庆年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郎中，外任府、道、运司、藩司。道光初年，外任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当时有人上奏请求让他入祀乡贤祠。道光皇帝因为他在任湖北巡抚时贪污受贿，官声恶劣而没有允许。曾国藩当时也知道这件事，深知此事不可为。

但转眼又一想，现在军情紧急，饷银难得，道光帝又已换成了咸丰帝，说不定皇上可以体谅。于是就上了一份奏折，以为自己纯粹是为国家作的一时权变之策，皇心必能理解自己一番苦心。

但自己刚誓师不久，就接到皇上的一封上谕，说自己这种做法“大干律令”，革职严办，最后因为自己要率领湘勇北上剿贼，故改作降二级留用。

想到这里，曾国藩心里明白透亮了，皇上是信不过自己这个带兵的汉人啊！从此，曾国藩看透了朝廷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时怀着警惕之心，处处谨慎，言谈、书信都小心措词，生怕哪天会被什么人抓住了把柄。

攻占武汉以后，曾国藩本想停兵休整，好好经营一下湖北，再以湖北、湖南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逼向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因此他在10月21日上书咸丰皇帝，提出攻占武汉后立即东下的可虑之处有三点：一是经过从岳州到武汉三镇的一系列战斗之后，湘军人员、武器都有很大损耗，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休整和补充，才能巩固和提高战斗力；二是太平军虽然遭到重创，但仍有相当实力，再加上他们又得到湖北、江西广大群众的支持，湘

军如果孤军深入，就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三是湖北经济尚未恢复，不能建立粮饷基地，湘军东进所需的粮饷仍需湖南供给，这样一来，远离后方，供应困难，就有可能因缺乏粮食、军饷而导致军心不稳，前功尽弃的后果。

应该说，在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之后，曾国藩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仍能保持着小心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客观冷静地审时度势。但咸丰帝却急于求成，完全低估了太平军的力量，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命他迅速东下，早日肃清江西，而将善后工作交给杨霈处理。他这一番盲人骑瞎马的乱指挥，完全打乱了曾国藩的原订计划，迫使他脱离后方，锐兵轻进，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在江西数年之内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3. 田家镇大捷

杨秀清在天京听到武昌失守的消息，又惊又气，立刻命令燕王秦日纲前往田家镇布置战守事宜，并将黄再兴、石凤魁等人锁拿天京问罪，面对湘军的嚣张气焰和咄咄逼人的攻势，秦日纲等太平军将领决定利用长江两岸有利地形，布置重兵防守，阻止曾国藩率军东下。

田家镇是一个有几千人口的大镇，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北岸上的一个整体市井。与田家镇隔江相对的半壁山，孤峰挺拔，雄峙在大江南岸。这里是长江最险的一处隘口，江面仅有一里多宽，江流湍急，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去年太平军就曾在这里击败清军有名的将领

江忠源。

太平军除了在这里设有重兵，准备与湘军决一死战之外，还在田家镇的上游蕲州设了阻止曾国藩东下的第一道防线，派著名的年青将领陈玉成在那里驻守。在田家镇，秦日纲则在半壁山层层筑垒，沿江安设大炮，另外还在半壁山与田家镇之间的江面上横拦铁索六条，铁索之下按一定距离排列几十只小船，船上安放枪炮，用来保护铁索。

这样，太平军就把田家镇一带布置得宛如铜墙铁壁一般，暗想曾国藩要想经过半壁山、田家镇，顺江东进，那比登天还难。

时值深秋，江水碧透，骄阳灿烂，曾国藩顺水扬帆，率师东下。

一路无事，船行至蕲州不远的道士滩时，曾国藩下令停船，与此同时，塔齐布率领的陆师也驻军铁领口，静候待命。

曾国藩察看地形，见陈玉成驻守的蕲州江面战船不多，陆军大部分驻军江南，似乎随时准备援助大冶、兴国两城。于是，心生一计，命令罗泽南和塔齐布各率领陆师一支，分别进攻兴国和大冶两城，引诱陈玉成派兵援助，然后，自己率领全部水师乘此机会，猛冲过蕲州。

第二天，塔齐布首先率领 6000 兵马向兴国进攻，陈玉成得报后，果然率领 4000 人马前去增援。但行至半路，忽又闻报说罗泽南又带兵 6000 进攻大冶，陈玉成无奈，只得又分出 2000 人马前去增援大冶。当陈玉成赶到兴国时，塔齐布已攻下兴国。陈玉成十分懊恼，又匆忙率兵赶往大冶，谁知刚到半路，就遇到从大冶溃败下来的士兵，报告说大冶已丢。陈

玉成气得两眼冒火，只得率部快快退回蕲州。

就在陈玉成离开蕲州的时候，曾国藩会合李孟群的水师共 20 营约 1 万人，在呼啸呐喊声中冲破蕲州太平军水师防线。

下一轮的战斗首先在长江南岸的半壁山展开。罗泽南、塔齐布在攻克兴国、大冶之后，合军进攻半壁山。11 月 20 日，罗泽南率兵先到半壁山下，接着塔齐布也到了，双方在半壁山下展开大战。由于湘军自湘潭一役以来，连打胜仗，斗志正盛，再加上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整顿，湘军中所剩的大多都是不要命不怕死的亡命之徒，所以个个不思退缩，凶悍异常。而太平军则正好相反，连吃败仗，有一部分士兵对湘军心存畏惧，士气首先就矮了半截。所以刚一交起手来，太平军虽然占尽地势之利，但仍处于劣势。结果，太平军迎战失利，退至山顶。

11 月 23 日，太平军虽然又增加了新的援军，由燕王秦日纲和北王韦昌辉的弟弟韦俊亲自指挥，分两路向湘军发起反攻，但一天苦战之后，太平军再次败北。这一次的失败，太平军不得不退至田家镇。半壁山要隘被湘军占领了。

半壁山失去以后，太平军尽失地利，剩下的能阻止湘军东进的屏障就只剩下半壁山、田家镇之间的铁索了。因此，田家镇一战的关键是在水师方面。

11 月 27 日，占领半壁山的塔、罗两师与冲过蕲州防线的杨载福、彭玉麟水师会商后，决定将水师兵分四路、与太平军水师在江面展开决战。第一路由各营中挑选出来的凶悍残忍之徒充任敢死队，负责破坏太平军的拦江铁索。第二路由

彭玉麟率领，其任务是负责攻击太平军战船，压抑对方炮火，掩护第一路破坏铁索。第三路由杨载福率领，其任务是在铁索断后，冲向下游，烧毁太平军的战船。第四路由李孟群率领，负责保护老营和后方辎重船只。

12月2日，曾国藩下令首先放炮击沉太平军护索小船。一声令下之后，数炮齐发，尖厉地呼啸着飞向太平军的小船。护索的太平军小船慌忙迎敌，但由于先失战机，敌人火力强大，所以还没来得及装上炮弹，就都被湘军击沉。接着，湘军选出的那些敢死队员们驾着20条快蟹，向铁索冲去，船上都放着一口大锅，锅里盛满油脂，燃上大火，将油脂烧得滚沸。湘勇们忍受着炙人的高温，将船驶至铁索旁边，将铁索拉到火焰上煨烧。等到烧得差不多时，便用铁钳将铁索夹出来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几个人手执板斧猛砍一番，将铁索砍断。不到两个时辰，六根铁索全被烧熔砍断。

拦江铁索一断，杨载福急令船队顺江而下，抢先赶到武昌，截断太平军船队的归路，然后再溯江而上，沿途放火，使太平军水师数千船只顿时化为火海。箭在飞，火在烧，刀枪相碰，鼓角雷鸣。湘勇为升官发财，个个不顾生死，凶狠狰狞；太平军为活命谋生，人人奋勇硬斗，强蛮顽梗。田家镇一带发生了一场亘古未见的恶战，只见双方死伤的人一个个掉进水里，未死的在江浪中拼命挣扎，已死的随波逐流，江水已被鲜血染红。半壁山似在低首垂泪，长江水也在呜咽悲号。

太平军自西征以来，水师船只不下万艘，潭湘、岳州、武昌几次大战均被焚毁不少，而尤以这次大战损失最为惨重。田

家镇战役以后，太平军九江以上的船只荡然无存，水师也基本瓦解了。湘军水师得手以后，塔齐布、罗泽南陆师也赶来助攻。太平军险要尽失，士气大丧，不得不于12月3日撤出田家镇，向西退却。

第二天，陈玉成也带兵弃蕲州城而走，与从田家镇撤出的太平军会合，两军一直退回九江。

田家镇之战，湘军虽然获胜，但也遭到巨大伤亡。曾国藩战后清点人数船只时说行军以来没有“丧失如此次之惨者”，“言毕放声大哭”。

4. 二次投水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长江上游，再加上基本摧毁了太平军水师，曾国藩等人非常高兴，来不及停下休整队伍，就立即令彭玉麟率领水师、塔齐布率领陆师，浩浩荡荡向长沙中游的重镇九江进发，叫嚷着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田家镇战败的消息传到天京，杨秀清急忙派遣太平天国的优秀将领石达开、罗大纲赶赴西线指挥。当他们率军星夜兼程赶到九江时，前线太平军又告失利，连连退却。这样，太平军只好南渡长江，合力据守九江、湖口两城。

九江形势险要，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东南多山，交通便利，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市镇。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著名骁将林启荣。

林启荣三十来岁，广西人，是金田起义的老兄弟，以骁

勇善战闻名全军。从金田打到天京，林启荣每仗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格外受到东王杨秀清的器重。九江在他手中已经经营了两年，在他的治理下，这座长江岸边的千年名城百业复苏，市井安宁，几万守城官兵也都训练有素，将九江牢牢守住，仿佛一座坚不可摧的长城。江西的上任巡抚在位时，曾几次派兵想把九江夺回来，但每次都碰得头破血流，大败而归。现在九江又凭空添了许多人马，再加上翼王石达开的亲自指挥，九江这一下更是固若金汤。

1855年1月3日，湘军占领小池口。第二天，湘军水师进抵九江；曾国藩进驻九江江面。与此同时，陆军驻扎在九江东门外四里坡，形成水陆夹击九江的局势。为了配合湘军的攻势，清政府又命令湖广总督杨需带兵2000由咸宁东出瑞昌，拊击九江的后背，还下令湖北方面的各军都交给曾国藩统一指挥。这样，清朝方面围攻九江的水陆人马已达到二万六七千人，大有乌云压城之势。

曾国藩待各路人马汇齐之后，便召集各路将领共同商讨攻城之策。罗泽南因为前年在围攻江西省会南昌时，曾经与林启荣交过战，那一次要不是江忠源带兵及时赶到，他差点就被林启荣一枪刺死了。这一次他一来要报昔日之仇，二来想要再立战功，于是当场献策说第二天可以兵分四路围攻九江城，定能成功。

曾国藩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第二天，湘军早早用过军饭，兵分四路向九江攻来。第一路由塔齐布带领，主攻西门；第二路由罗泽南、李续宾率领，主攻东门；彭玉麟率领水师由桃花渡登岸，攻打九华门；杨载福、李孟群主要负责封锁

江南，挡住从下游湖口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并堵住北门。妄图四路人马并举，乘势一举攻下九江。

然而，九江守将林启荣、石达开等固非石凤魁、黄再兴等贪生怕死之辈可比，现在的九江也要比武昌坚固得多。再加上守城将官们因为前几次连吃败仗，这次因为石达开的到来倍受鼓舞，斗志旺盛，血管里都涌动着报仇雪恨的急流。所以一见敌人前来攻城，都个个奋勇，人人争先，要为死难的兄弟报仇雪恨，直杀得湘军丢盔弃甲，卷旗逃命，塔齐布、罗泽南等人无法制止。

曾国藩见第一天攻城未见成功，就改变战略，想绕过九江城，先攻取湖口和湖口对面江中的梅家洲，同时仍派小部分兵力攻打九江，以牵制九江兵力。

湖口也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鄱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的梅家洲，是一个长约40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由长沙内的泥沙在此沉积而成。梅家洲的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

很有军事眼光的石达开看中湖口与梅家洲之间，正是聚歼湘军水师的好地方。现在见曾国藩分兵进攻梅家洲和湖口，便也相应地改变了军事布置，由林启荣继续驻守九江，自己镇守湖口，派罗大纲守住梅家洲。他们见湘军气势汹汹，攻势很旺，便决定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湘军顿兵于坚城之下，寸步难行。

这样，连攻几天，湘军果然锐气大减，眼见敌人已如强弩之末，石达开等人便开始谋划破敌之策，准备趁敌人松懈

之时大举反攻。

由于久战无功，曾国藩心中非常急躁。从自己出师以来，虽然吃过几次败仗，但凭借水上优势，自己还是胜的多，尤其是拿下武汉三镇以后，湘军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东下之举，势如破竹，太平军只有节节败退。现在竟然被拦住了。曾国藩绝不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乱贼匪首，能够阻挡乘胜前进的王师，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攻克九江、湖口，自己多年的梦想眼看就要成为现实，自己苦战两年多的成果为今后的荣升、为曾家的兴旺已打下基础，这一切决不能毁在这里，否则功亏一篑，前功尽失。

然而，正当曾国藩恼火异常，梦想升官发财的时候，他做梦也想不到，几战下来，石达开这个太平天国年青的王爷，已看穿了他的水师的致命弱点，要置他的性命所在——湘军水师于死地。

湘军水师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长龙、快蟹等大船，一部分是舢板小船。大船笨重，只能用于指挥载重，却不宜迅速移动；小船机动灵活，可以来往穿梭，行动自由。曾国藩将二者配合使用，取长补短，以进行水战。但如果将其分开，则必然自顾不暇，失去战斗力。同时，太平军大部分船只已在上几次战役中被毁，幸存下来的少数水军很难与湘军强大的水师争锋，如果以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因此，虽然看到了敌人的弱点，但欲破强敌，还是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于是，石达开等人定下一计，传令下去，依计行事。

从第二天开始，九江、湖口、梅家洲各处太平军一律遵循翼王号令，白天任湘军水陆兵马如何挑战，一律高挂免战

牌，守城不出。入夜，太平军则派兵沿长江西岸鸣锣敲鼓，放出船只到江中，将火箭、火球等不断射入湘军船内，弄得湘军水师夜夜惊恐，不得安宁。

这样，湘军水师自出长沙以来，转战千里，连陷重镇，战功显赫，早生骄气。现在又被连日惊扰，并且求战不得，军心早已浮躁不安。一骄一躁，太平军就有了可乘之机。

1855年1月29日，太平军利用敌军急于求成的心理，先派少量船只前去挑衅，然后假装不敌，驾船往鄱阳湖内退去。湘军水师等了多少天，终于看到敌人露面了，再加上受到连日惊扰，早已恨不得把太平军一口吃了去。现在见敌人不支，慌忙退去，他们哪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因此，一见太平军驾船逃走，由于长龙、快蟹等船移动不便，怕追赶不上太平军，因此，急忙令李孟群调出全部舢板，尾随追去，认为人多势众，必能将这股太平军尽数歼灭，以解这几天的心头之恨。

这样太平军在前，湘军在后，一逼一退，转眼到了鄱阳湖口。这时，太平军将船头一拨，船队立刻进了鄱阳湖。李孟群一见，眼看就要追上了，到口的肥肉岂能让它溜走，于是，仗着人多船多，略一迟疑，便也跟着进了鄱阳湖。谁知李孟群等船刚进湖口，后面的入口处突然冒出数百条太平军战船，将退路完全封锁起来。前面溃逃的几十条太平军战船，这时也稳住阵脚，掉过头来，开炮射击。这样，几百条湘军舢板如同掉进了一个锁住口的袋子里，腹背受敌，再也逃不出去了。李孟群见到这种情况，才大呼上当，捶胸顿足，懊悔不迭。无可奈何之中，便索性指挥舢板向湖心划去。

过了很久，曾国藩还不见舢板回来，这一下他可急了，忙

派人飞骑前去打听。不久，探子回报：所有前去追敌的舢板全部陷入鄱阳湖中。曾国藩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又见亲兵急匆匆地进来禀报：太平军的战船向这儿开过来了！

曾国藩出舱看时，只见下游黑压压一片，无数条战船向这个方向压来。曾国藩急得直跺脚，宛如要跳了起来，连骂自己指挥失误，调度无方，以至上了太平军的大当。现在所有舢板都已离开，剩下的这些快蟹、长龙大船就像老虎失去四肢，鹰隼砍断双翼一样，只能蹒跚笨拙地移动，难以应敌。昔日那种灵活快速，依靠长龙、快蟹掩护，舢板主动出击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现在全仗船上装的重型大炮的射击，太平军的船只才不敢过于逼近。这样，就在引诱舢板离开的当天，驶入湘军船队中的小船与岸上的太平军互相配合，不断投掷火球、火罐等物，共烧毁湘军大船 9 号，中等船只 30 号。

遭到袭击的湘军水师，纷纷把船向上游开去，不听彭玉麟指挥，曾国藩无奈，只得急忙调回正在武穴养病的杨载福，继续统率原来由他带领的那部分水师。在陆军方面，曾国藩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把进攻湖口的罗泽南、胡林翼调回九江，加强对九江的攻势。

就在曾国藩将罗泽南调回的当天晚上，即 1855 年 2 月 11 日夜間，太平军又集中力量对湘军水师发起了更大的进攻。那天晚上，恰逢阴天，没有一点月色，伸手不见五指，正是偷袭的绝好时机。太平军从九江、小池口分别抬出小船：十艘放入江内，挟带各种火器，钻入湘军船队放火延烧。太平军小船灵活快捷，湘军大船蠢笨缓慢，再加上天黑莫辨，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太平军小船，湘军水师内部一片慌乱，刚

从睡梦中惊醒的湘勇们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有的甚至连衣服都找不到，勉强爬起来的，跑到大炮跟前，胡乱放了一阵，有的炮弹竟落在了自己人的船上。

曾国藩的座船上这时也是一片慌乱。太平军中有人认得中间偏后的那座特大船是曾国藩的拖罟，于是一声呼叫：“曾国藩老妖头的船在那儿！活捉曾国藩啊！”一呼百应，一时间十几条快船如同十几条矫健灵敏的猎狗向曾国藩的座船冲去，而曾国藩的托罟就像一只愚笨的大狗熊，被这群猎狗弄得目眩头晕，惊慌失措。负责保护曾国藩的亲兵们先是拼命发射炮弹，不一会儿炮弹发完，没有一点还手之力了。这时，十几条小船已冲了过来，接着，船上的一百多名水手纷纷跳上了拖罟，拖罟上的湘勇仓猝应战，但又毫无斗志，一个一个被勇猛的太平军将士刺倒在甲板上。

曾国藩虽然身为2万湘勇的最高统帅，但却手无缚鸡之力。这时他被吓得躲在内舱里，哆哆嗦嗦，身边只有几个亲兵，彭玉麟、杨载福等水师大将都不在拖罟上。曾国藩两眼死死地盯着船上的厮杀，既不能指挥兵勇们去肉搏，又不能亲自持刀前去抵抗，正在悔恨间，猛然听得有人大喝一声：“弟兄们，曾妖头躲在这里！”

立时舱门口出现一个长身健壮的汉子，手执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接着更多这样的人出现在舱口，亲兵们立即一窝蜂上去阻挡。曾国藩看到数步之外刀枪拼击，血肉横飞，不觉心胆俱裂，四肢痉挛，知道自己此次必死无疑，与其落在贼手受辱而死，倒不如自己来个干脆。于是曾国藩推开身后的舱门，翻身滚入江内。

恰好彭玉麟驾着一条小木船过来，见到有人跳水，看看依稀像是曾国藩，急令人下水将其救起，一看果然是曾国藩，七手八脚地把他托上船去，急忙送到岸边罗泽南的营中。

回到岸上，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后，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逃，只剩下有限几条船只停泊在罗泽南营旁边，情景十分凄凉。想起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湘军水师，本以为能够天下无敌，帮助自己建功立业，谁知竟遭此下场，深感大势已去。又念及自己刚刚从水中被捞起的形象一定狼狈之极，身边的将士们也都看见，身为全军统帅，不能身先士卒，上去杀贼立功，现在又如此威风扫地，自己以后如何对他们发号施令？想到这里，曾国藩愈发感觉羞愤难当，于是命人牵过一匹坐骑，欲仿效春秋时期晋国大将先轸，策马赴敌而死。罗泽南等人见状，紧紧抓住马缰，经过一翻苦苦劝解，曾国藩这才作罢。

5. 坐困江西

太平军在石达开的率领下，于湖口、九江袭击湘军水师大获成功之后，全军上下极受鼓舞。鉴于这种情况，太平军便决定兵分三路沿长江上行，逐步夺回失去的重要城镇，发动战略性反攻，打击湘军的军事后方，重新夺回长江航线的控制权。

这样，太平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兵分三路溯江而上。东路人马由小池口向北进发，接连攻下黄梅、广济，将湖广总督杨霨一直追到汉口；中路由九江逆水西上，沿途攻占蕪州、

黄州，直捣武汉；西路由富池口出发，经兴国拊攻武昌之背。

2月23日，太平军重新占领汉阳，并对武昌发起进攻。这一下清政府立时慌了手脚，急忙下令曾国藩派兵回师助剿，援救武昌。曾国藩遂派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率领湘勇水陆两路先后回师援鄂。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4月3日，太平军将士在韦俊的率领下，终于第三次攻克武昌。接着，太平军控制了湖北省的大部分地区，使湘军的后方极不稳定。这时，曾国藩更加相信去年9月份攻占武昌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就立即挥师东下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但此时的曾国藩也害怕如果立即退兵，回攻武汉会引起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所以，他宁可顿兵坚城，被动挨打，也不肯撤出江西，回争武汉，终于造成了坐困江西的局面。

在攻克武昌的过程中，湖北巡抚陶思培被击毙城中，总督杨霨仓皇逃出城去。这一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朝野震动，咸丰皇帝龙颜大怒，立即撤了杨霨的职，任命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胡林翼为湖北巡抚。

重占武昌后，从武昌到江宁，长江两岸的重要集镇，全部又由太平军控制，江面上，挂着绣龙杏黄绸缎蜈蚣旗的太平军战船来往航行，畅通无阻，太平天国鼎盛的局面到来了。

饱尝尽丧水师之痛的曾国藩，每每看到蜷缩在岸边的东倒西歪的长龙、快蟹，再想起被锁在鄱阳湖中的舢板，心中总是痛苦不已。

水师是曾国藩的命根，在一定程度上，曾国藩觉得水师比陆师更亲近。因为水师的将领都是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在

曾国藩的内心深处，他实际上把水师视为自己的嫡系部队。现在水师遭此重创，曾国藩决不会让它就此一蹶不振。

为重振水师，他命令在湖北新堤的造船厂，要不分昼夜，不惜任何代价尽快为他修复旧船，赶造新船。上次派彭玉麟回师湖北，其实际目的也是派彭玉麟到金口修复船只，另外让他到湖南去招募新勇，扩充水军。对于那 100 多条被困在鄱阳湖内的舢板，他更是心急如焚，因为这些舢板由于没有辎重大船随行，不但无法冲出鄱阳湖，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发生了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亲自跑到江西省城南昌，与巡抚陈启迈商量，央求他为湘军造长龙船 30 号，交给内湖水师使用。经过一番努力，到 1855 年 7 月份，湘军的外江水师又扩充到 10 营 5000 人，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规模。同时，内湖水师也扩充到 8 营 4000 人，供给、吃饭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曾国藩急忙令彭玉麟化装成商贩，经过太平军的控制区，与内湖水师接上联系，然后由他带领这支队伍驻扎在南康府，伺机冲出湖口，与外江水师会合。

曾国藩自出湖南省作战以来，一直随水师行动。但自从座船在九江被太平军俘获后，就弃船登岸，随陆师行动。

起初，湘军陆师在江西约有 1.2 万人左右，分别由塔齐布、罗泽南、李元度统领。塔齐布手下的人最多，约有 6500 人，罗泽南次之，约带领 3500 人，李元度手中的人最少，只有平江勇 2000 人左右。这李元度本来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眼睛深度近视，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由于曾国藩湖口惨败之后，曾国藩手下无人，李元度便自告奋勇要率领 2000 人马，前去彭玉麟内湖水师的驻地南康府，与水军相互依护。曾国

藩由于无人可用，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这支队伍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曾国藩在江西主要依靠的还是塔齐布、罗泽南两部。

湖口惨败以后，曾国藩又不愿回师武汉，无奈之中，只得继续围攻九江。他认为只要湘军能够坚持连续攻城，九江定可不日而下，于是集中优势兵力，加紧攻城，昼夜苦战。而太平军守将林启荣仿佛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一样，只是构筑工事，坚守不出，硬是把一座九江城守的铜墙铁壁一般，使曾国藩的一切手段都无法得逞。

就在曾国藩为九江战事一筹莫展的时候，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由于久攻九江无功，塔齐布于8月30日呕血而死。

塔齐布盛年溘然去世，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事。正是曾国藩将塔齐布由一名都司衔署理抚标中营守备，仅一年多时间内，便迅速提升为湖南水陆提督。也正是这个塔齐布，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了几场漂亮仗，为湘勇大壮声威。曾国藩不能没有塔齐布。他需要塔齐布为自己带兵打仗，他更需要他为自己制造一个满汉亲密无间的形象，以消除朝野内外的各种猜忌、嫉妒以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如今在这江西战局进退维谷，晦暗不明的时候，塔齐布竟然长逝了，这对曾国藩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

就在这时，太平军又由湖北回师江西，很快攻占义宁并全歼了曾国藩向南昌派去的援兵。江西省城大为震动，曾国藩急派罗泽南前去援救义宁，以阻止太平军由鄂返赣。

罗泽南见江西战场无所作为，就想带领一支人马到湖北去建功立业。于是他多次和曾国藩商量，要回师武汉，并说：

争取整个战局主动权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九江、湖口两镇。太平军上控武汉，下据江宁，九江是其中游要塞，太平军必然拼死据守，即使一时被湘军攻克，太平军也要尽力夺回，况且湘军永远无法摆脱在江西被动挨打的局面。要想改变目前的不利形势，惟一正确的补救办法是立即由他带领一部分主力西撤，巩固湘军的后方。

对于罗泽南的分析，曾国藩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独到，深谋远虑。但就曾国藩目前的处境来说，他实在不愿意让罗泽南走。塔齐布已死，罗泽南再一走，曾国藩失掉了两个最得力的助手，这无疑是砍去了他的左膀右臂，但曾国藩必定还是有军事头脑的，在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着眼大局，冷静地分析局势，为湘军的长远利益着想。因此，虽然曾国藩极不愿意，但还是忍痛割爱，让罗泽南率领他的部下回援武昌。

塔齐布死了，罗泽南现在又走了，曾国藩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一连几天都是心绪不宁。如此一来，曾国藩手中所剩的仅有塔齐布死后留下的由周凤山带领的5000余兵马，李元度的平江勇及困在内湖的一部分水师。

罗泽南领兵西进过程中，连攻数镇，直逼武昌城下。这时湖北巡抚胡林翼正在为战事苦恼，由于手中没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以连吃败仗。现在罗泽南率兵来援，无异于雪中送炭。于是对罗泽南委以重用，极力笼络。这样，胡林翼以罗泽南的这支军队为骨干，不断仿照湘军那样，从各地招募勇丁，连年扩军的同时，还对原先的绿营兵加以整顿，逐渐将他们淘汰掉。这样，湖北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

为长江上下兵力最强的一个省份。

与湖北的情形正好相反，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日益狼狈起来。太平天国在湖北的军事形势稳定之后，石达开便留韦俊在武昌据守，自己率部回师江西，乘江西军事力量较弱的时机，加大攻势。从1855年11月起，石达开就联合天地会各路义军，接连攻下瑞州、临江、袁州等一系列州府，最后发兵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从九江撤围，调周凤山前去援救吉安。当时吉安形势危急，南昌也是兵力空虚，曾国藩是既怕省城有失，又怕太平军再陷吉安，因此，名为派周凤山援助吉安，其实是派他驻兵樟树镇不动，观望形势。石达开利用周凤山举棋不定，犹疑不决的时候，一举攻破了吉安府城，接着又连锅端了周凤山的樟树镇大营，周凤山大败而逃，纷纷溃入南昌城内。一时间江西官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周凤山调军无能，指挥不当。

樟树镇大败清军之后，石达开又乘胜追击，直逼南昌城。曾国藩此时被困在城内，焦急万分，甚至连与外界的联系都已中断。曾国藩写封家书都得用蜡丸隐语，化装潜行，其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太平军围住南昌，曾国藩昼夜不能安睡，被搅得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上书朝廷，请求派罗泽南前来解围。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这封求援文书发出不到10天，他昔日的部下因为在围攻武昌过程中，被太平军击中头部，医治无效死掉了。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处于绝望的顶点。

6. 二次奔丧

就在曾国藩一筹莫展的时候，石达开忽然退兵。原来，就在石达开左右出击，以图扩大战果，夺取江西全省的时候，清军的江南大营突然围攻天京，石达开奉洪秀全之命急回天京解围。这样一来，江西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小，曾国藩绝处逢生。再加上各路援军陆续到来，攻下瑞州等城，其中有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带领他刚从家乡招募的 6000 人马，刚进江西就攻破了安福城。这给了处于困境中的曾国藩以极大的希望和安慰。

然而，军事上的好转并没有使曾国藩完全摆脱苦恼。攻克武昌之后，曾国藩突然失掉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已深深感到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后来清政府又不断派满人在他的军营中，名为随军打仗，实则派人监视他的言行。因此曾国藩常常有置身危崖的感觉。东汉时有个名叫杨震的学者，后来官至太尉，但因得罪朝中权贵，不断受到猜忌和排挤，最后被迫在洛阳城西夕阳亭自杀身亡。这位熟悉历史，深知伴君如伴虎道理的湘军头领曾国藩，每与自己的好友刘蓉、郭嵩焘谈及这件事时，总是慨叹良久，感到自己将来也会落到杨震那般下场。

此外，曾国藩不仅受到朝廷的猜忌，还始终受到江西地方官吏的排挤和刁难。在湖南创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就因为军饷、用人等问题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搞得非常僵，最后不得不率勇出走衡州，远离长沙，现在到了江西，这种情

况依然没有改变。曾国藩以一个团练大臣的身份创办湘军，又以乡绅的身份带兵打仗，这本来就被许多官员视为出风头的越举行为。他一来没有地方实权，二者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因此不仅他，而且整个湘军似乎都名不正，言不顺，处处受到轻视、刁难和掣肘。曾国藩带兵在江西打仗，本来是为保护江西地方官绅、地主的利益，所以军饷等物资都应由江西供给，而江西官吏则往往把这视为一项额外负担，百般刁难。他们对曾国藩的军队也是事急则用，事过则弃，胜不予褒，败则相讥。这样曾国藩在江西处处有寄人篱下之感，在官场中也是步步荆棘，处处碰壁。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后来虽然上折参掉了江西巡抚陈启迈的乌纱帽，但后来的新巡抚与他关系依旧不好，曾国藩仍然处处受限制，带兵打仗，筹集粮饷始终不能顺利。

就在曾国藩被困江西，山穷水尽之时，1857年3月6日，忽然接到他的父亲曾麟书去世的讣告。曾国藩伤痛之余，不禁又为自己暗暗庆幸起来，如果说当年母亲的去世最不是时候的话，那么父亲不早不迟，偏偏死在这个时候，真可谓恰到好处。以他目前在江西的局面，处处掣肘，如果硬着头皮干下去，以后的处境只怕会更困难，如果无故撒手不管，上上下下肯定又不会允许。因此，父亲的死对他来说真可说是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想不如趁此机会，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等到朝廷无法收拾残局，还得来求他，那时再利用机会与皇上讨价还价，要回地方实权，自己的处境就会好多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立即给皇上上了一道回籍奔父丧折，奏

请“开缺丁忧”。此后，不等皇上的谕旨下来，便委军而去，与弟弟曾国华、曾国荃一起回家奔丧。

回到乡间以后，曾国藩心中并不平静，想起了自己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上的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几年来他真可谓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落得个皇上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乎陷于通国不容的境地。曾国藩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愤不平。

回到家不久，曾国藩便接到了皇上的圣谕，赏给他三个月的假期，令其回籍治丧，假满以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假满之后，曾国藩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于是又奏请皇上让他在家守制三年，咸丰皇帝没有答应，仍命他遵前旨。曾国藩心中暗暗高兴，深知江西事务难办，湘勇又必须自己亲自指挥，认为皇上要想剿灭太平军，就非得用他，于是借机向皇上摊牌，否则自己就在家终籍守制，以尽孝心。

曾国藩哪里想得到事隔半年，前线的局势已大不一样了。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严重分裂，那就是“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逼迫洪秀全封他为天王，洪秀全密令北王韦昌辉包围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其眷属全部杀害，接着又杀死其部下2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赶回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韦昌辉又想将石达开也杀死。石达开只身连夜逃出天京后，韦昌辉就杀害了他的全家。韦昌辉的暴行激起了太平天国的合朝公愤，洪秀全于是又下令处死韦昌辉，并命令石达开返回天京，总理政务。但经过这一事件以后，洪秀全对石达开心存疑忌，又加封自己的两个哥哥分别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带兵离开天京独立

作战。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大大削弱了战斗力量。清政府又重建江南大营，重新将天京围困起来，湖北、江西战场也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攻克了武昌、九江、湖口等军事重镇。咸丰皇帝此时早已看出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觉得有无曾国藩都无碍大局，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了曾国藩在籍守制的要求。

曾国藩本想以此要挟皇帝，能得个有权的职位再领兵出山，谁知偷鸡不成蚀把米，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有苦难言，只得闲居在家。

六、决战安庆

1. 再次出山

回湘乡为父守丧以来，曾国藩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的回忆，都只能多给他增加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一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这痛苦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在修身养性方面的种种弱点，思考自己处处碰壁的原因。经过这一番痛苦的自省过程，曾国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以前在为人处世上的错误。以前，他对于官场的欺诈、虚伪、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等作风极为反感，做事丝毫不讲情面，因此处处与人发生矛盾，受到舆论的讥讽。经过这次深思之后，曾国藩认识到仅凭匹夫之勇，意气行事是不行的，官场多少年来行成的恶习已几乎牢不可破，以自己一人之力，想完全改变这种风气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就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处世方式，变得圆滑世故起来，比以前更善于做官了。

自省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自我解剖过程，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事。因此，虽然曾国藩这时

对自己以前的做法已然悔悟，但他依旧很压抑。

这一年多来，曾国藩解职在家，虽然说是他自己的请求，但实在是出于无奈，而并非他的本意。后来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他的率领，湘勇竟然捷报频传。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湘军将领都纷纷升官加衔，胡林翼官至巡抚，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甚至连杨载福都官至提督，并均赏黄马褂。而原来那个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率似乎被所有人都遗忘了一般。看来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的是，皇上并不需要自己。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军队，让别人驱使着，成为别人显身扬名，建功立业的工具，曾国藩不仅有被冷落的感觉，更有被别人利用、愚弄的感觉。然而在籍守制是自己的请求，自己这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因此，曾国藩的心情愈发烦闷。

雪上加霜的是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曾国藩以前与人相处，每遇到意见与人不同时，对人家总是连加讥讽，嘲笑不已。这一次他却是委军奔丧在前，伸手要权于后，权未到继而坚卧不起，这就与他自许理学家的身份很不相称，更与往日忠君报国的言词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社会上不同人的责难与报复，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老朋友左宗棠的攻击。去年春天，左宗棠听说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后，就毫不掩饰地肆意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说他以前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全是虚伪的谎言。左宗棠带头如此攻击，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这消息传到蛰居在家的曾国藩耳中时，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短，

无词可辩，这给他本就憔悴不堪的身心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遂得“不寐之疾”，夜夜失眠，恶梦不断，让曾国藩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能够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但个人感情上却嫌隙甚深，无法泯灭。

由于诸事不顺心，曾国藩的心情愈来愈烦躁，常常是看什么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迁怒弟媳，责骂弟弟，弄得曾府上下，人人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会惹得曾国藩大怒。

正当曾国藩在家苦恼万分，懊悔不迭的时候，前线局势也有了很大变化。1858年3月，离开天京之后的石达开率领20万大军由饶州、广信一带转入浙江，很快攻占常山、江山等地区，并对衢州发起围攻。曾国藩的老朋友胡林翼趁机上书咸丰皇帝，奏请让曾国藩再次带兵赴援浙江，胡林翼让曾国藩再次出山，主要是想让他助自己一臂之力，早日平乱，再者也可以回报曾国藩以前的推荐之恩，为老朋友谋得一处地方实权。清政府考虑到湘军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将领都听他的指挥，只有他才能统一指挥各路湘军，他在湘军中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由他出来领兵，可以加强湘军各方面的联系，尽快剿灭太平军，所以就同意了胡林翼的奏请，谕令曾国藩再出山统兵。

曾国藩接到谕旨之后，真可谓久旱遇甘霖，连称“圣恩高厚”、“感激之忱，匪可言谕”，对皇上这次命他再度领兵，他感激涕零。于是这次再也不敢提什么统兵大员非位任巡抚不可以成功的旧话，向皇上讨价还价，索取抚督大权了。曾

曾国藩于1858年7月13日接到命他急速援浙的圣旨，17日就从家动身，其间不敢有丝毫耽搁，深怕皇帝改变初衷，收回成命。临走之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兴高采烈地对他的弟弟曾国荃说起了一段故事：他父亲年青的时候，有一次到南岳烧香拜菩萨，在上封寺求得一签，签上写着：“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曾麟书异常高兴，曾经对他夫人说：“我将来必有两个儿子在浙江做官。”这次皇上命他带兵入浙，曾国藩忆起了这段往事，便断定这是他和其弟曾国荃入浙的吉兆。

二度出山，曾国藩对前途又充满了希望，他相信，凭自己的才干和抱负，经过一年多痛苦的自省，自己必然能以更为圆熟的技巧、老到的功夫，在东南这块血与火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迥异往昔的精彩之剧来。

2. 进军皖中

曾国藩这次出山的最高目标在攻克天京，彻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此，他这次重新领兵之后，并没有盲目地听从咸丰皇帝的指挥，把湘军的所有兵力都布置到浙江去，而是先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太平天国据守长江下游，要想攻克天京，只能从长江上游各省着手。现在清军已基本控制住了湖北、江西等省，太平军势力较强的只有安徽一省，如果湘军能再控制住安徽省的局势，那么天京迟早要成为一座孤城。所以他这次出兵，首在争夺安徽，自己入浙，只带领一部分战斗力并不太强的人马随去，而把湘军的精锐之师交

给李续宾、弟弟曾国华率领，攻打庐州，进逼安庆。

1858年8月，曾国藩奉命按原定计划，率领一部分湘军入浙，但他刚行到江西广信府时，又接到咸丰皇帝的紧急上谕，说石达开已从衢州撤围，南走福建，命他率部改道福建。曾国藩又不得不辗转南行，直奔福建而去，10月份，到达江西建昌府后，把大营扎在建昌府。这一路上，曾国藩行军顺利，始终没遇上较强的抵抗，真可谓处处得手，一帆风顺。不料，正当他梦想一年之内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的时候，波涛骤起，风云突变，迅速改变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力量对比。

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沉重的打击。洪秀全也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便自兼军师，为扭转岌岌可危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罢免了两个不得人心的兄长，又起用林绍璋、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加强了领导集团的内部团结，使天京事变后一度混乱的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首先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后又汇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接着又乘胜追击，直下浦口，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

奉曾国藩之命进军皖中的李续宾部，在陈玉成攻克庐州后，收到咸丰皇帝立即夺回庐州的命令，迅速向庐州靠拢，驻兵三河镇。

三河镇地处要道，是太平军屯粮的地方，所以太平军在此驻扎重兵，设防坚固，易守难攻。李续宾曾经攻下九江城，打了几次胜仗，在湘军中有“无敌之师”之称，气焰十分器

张，根本就不把三河镇放在眼里，冒然进兵。陈玉成、李秀成攻破江北大营后，听说安徽告急，立即率兵赴援。李续宾久攻三河不下，又被陈、李的后援大军包围住，这才派兵向武昌求救。恰巧胡林翼又因母丧回家，武昌城内只剩下最忌恨湘军的湖广总督官文，见到李续宾的求援信后，置之不理，既不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又不令其退兵。李续宾大失所望，只得硬着头皮撑下去。没有几天，这支被曾国藩视为湘军骨干的精锐之师 6000 余人全军覆没，李续宾和曾国华同时毙命。

李续宾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江西建昌府时，曾国藩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吓得几乎晕过去。他曾经对李续宾报以极大厚望，希望他能好好经营皖中，为自己将来顺利拿下天京作好准备，谁知他竟然坏了大事，不仅使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让自己的六弟赔上了性命。曾国藩伤痛欲绝。不惟曾国藩如此，连在籍守丧的胡林翼听到这一消息后，也是大恸仆地，呕血不起，当即放下丧事，连夜赶回武昌收拾残局。

正当曾国藩因为三河镇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国荃率领他的嫡系部队吉字营湘军，攻破了吉安城，接着其他几路湘军也不同程度地打了几次胜仗，这给了曾国藩以莫大安慰。曾国藩从吉安之胜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于是便让曾国荃回家，招募湘勇 1 万人，然后编练成军，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后来也果然不负他的重望，作战勇猛，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个个凶狠残忍。每

攻下一城，曾国荃总是大开杀戒三日，这三日之内，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曾国荃一概不予过问，因此，这支军队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859年1月，曾国藩得意门生——李鸿章来到建昌投奔于他。李鸿章是曾国藩好友李文安的儿子，1845年投奔曾国藩门下，拜他为师。曾国藩见李鸿章长得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心中很是满意，更兼李鸿章有人所不及的乖觉，过目不忘的记性，深为曾国藩所赏识。但李鸿章心高气傲，性格疏懒，为人不够实在，细节上不大检点，这些方面又与曾国藩不合。李文安曾经给曾国藩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李家以前养过一缸好金鱼。李文安有一天偶然跟家人开玩笑说，如果今年金鱼产子多，那么门徒中进学的就多。后来果然这一年金鱼产子很多，李文安于是就扳着指头数这个可以进学，那个可进学。谁知第二天起来一看，一缸金鱼全部让人弄死了。李鸿章坦然承认这是自己干的。李文安问他：“金鱼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将他们全部害死？”李鸿章理直气壮地说：“这么多人进学，惟独我不进学，此鱼不可留。”其实那年他才11岁。从这件事上，李文安看出儿子虽然心高志大，但胸襟未免太狭窄，手段也太刻薄了。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后来又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投靠曾国藩来的。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

对他委以重用，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3. 强围安庆

曾国藩这次出山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安徽，稳扎稳打，步步进逼天京，但自从李续宾三河惨败以后，他不得不推迟了这个计划。再加上清政府仍不委他以大权，曾国藩的头上至今仍是一个兵部侍郎的空衔，没有一点实际意义。而且清政府实际上也并没有想让曾国藩去攻打天京，让他出山，只不过是想借助湘勇的力量收复长江中上游各省失地，对付绿营兵难于对付的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因此，清政府实际上就是让湘军出力，然后旗人和绿营兵坐收渔翁之利。

曾国藩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带兵这么多年以来，朝廷始终没有对他信任过，湘军虽然也以能征会战著称，但依然受到歧视，无论在饷粮，还是在武器供给上都远远不如腐败无能的绿营兵。但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君命总是难违，自己要想升官发财，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皇上。所以曾国藩信奉的惟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寻找机会，徐图自强。

1859年6月，石达开见在江西毫无建树，便有入川之意，骆秉章、胡林翼等探知此情后，立刻通过旗人官文上书皇帝，要求派曾国藩入川布防。本想通过入川为曾国藩谋取四川督抚一席，让他有个落脚之地，可谁知咸丰仍不给他地方实权，只令曾国藩督军，不给他职位。胡林翼一看到上谕，知道此事不可为。于是又通过官文上书皇帝让曾国藩暂缓入川，与

胡林翼一同进攻安徽。咸丰又同意了官文的奏请，命曾国藩驻扎湖北，以图安徽。

清政府的这一决定，成为曾国藩一生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不仅湘军的军饷供应有了保证，而且处处得手，事事有人相帮，再不像以前在湖南、江西的情形了，甚至比第二次出山的时而浙江、时而福建、时而四川要好得多。这时，因靖港惨败溃逃被遣回家的曾国葆又募勇两营，声言为其兄曾国华复仇，改名贞幹，复新随作战，曾国藩大为高兴，带兵打仗，忠诚效力还是自己的亲兄弟好。从此，曾贞幹与曾国荃合兵一处，成为曾国荃以后围攻安庆、攻陷天京的得力助手。

在湖北安定下来之后，曾国藩又得到巡抚胡林翼的大力支持，于是放开手脚，开始实施他逐步控制安徽的计划。

曾国藩进攻安徽的中心目标是太平军重兵设防的安庆。安庆是天京在长江上游的最后一道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攻下安庆，不仅可以乘势东下进攻天京，同时还可以切断太平天国长江南北的物资来源。

1859年11月18日，曾国藩率领万人从巴河出发，这次进军的目的地是太湖。太湖地处湖北通往安庆的要道，曾国藩想要围攻安庆，就必须打通太湖这一关，因此，太湖之战实际上也就成了安庆决战的序幕。

陈玉成的英王府设在安庆，安庆是陈玉成经营了多年的巢穴，因此，当他闻报曾国藩兵临太湖，意图围攻安庆时，便立即率师援救太湖，扎营70多座，打算从外面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

曾国藩进攻太湖时是兵分两路向太湖进发的，一支由自己率领，另外一支由多隆阿、鲍超等率领。他本想待两方面军队会合之后围攻太湖，当时胡林翼未随军而来。当胡林翼听到陈玉成率部援助太湖时，立即写信给曾国藩，让他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只留少数人马围攻太湖，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援军。并任命多隆阿为前线总指挥。

多隆阿，满州正白旗人，原来驻防黑龙江省，入关后跟从皇上的表兄僧格林沁。后来改归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调遣。多隆阿基本上仍保持着关外旗人的剽悍气质，精于骑术，作战勇猛，但为人甚为傲慢，尤其看不起汉人和汉官。但由于胡林翼善于笼络人心，和旗人官文的关系较好，所以多隆阿乐于听从胡林翼的指挥。而他对曾国藩和湘军却大不以为然，从不买他们的帐。

曾国藩见胡林翼让他把前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多隆阿，内心极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作强烈反对，只得遵命。湘军各将领一听说要把指挥权交给多隆阿，也都纷纷表示反对，曾国荃一听到这种情况，则根本不把兵带到前线。因此，多隆阿虽然名为前线最高指挥官，但他实际上能指挥的军队只有自己的部下和湘军鲍超的部下。

鲍超，绿营兵出身，曾国藩当初在长沙办团练时，他在塔齐布的部下，以凶残好斗闻名。曾国藩九江、湖口惨败后，鲍超与水师退至金口，与胡林翼在一起，后来渐渐被胡林翼所赏识。1856年胡林翼命他去湖南募勇，自带一营6000余人，归多隆阿统辖。鲍超以凶狠残忍著称，其手下勇丁也大多跟他一样，都是一群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平时也

是奸淫抢掠，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其作风与曾国荃差不多。

鲍超本来也不愿听从多隆阿的指挥，但这是胡林翼的决定，因此只得屈从。由于他们之间有这样的矛盾，所以指挥始终不能统一。

驻兵伊始，鲍超见太平军来势凶猛，便建议在太湖附近进行阻击，但多隆阿不同意，命他带人到太湖东北的小池泽驻扎，以阻隔太平军的援军。这样，鲍超一支人马远离湘军，只与多隆阿的部人相近，成了湘军中最孤立的部分。陈玉成见状，立即派兵将小池泽团团围住，多隆阿因惧怕陈玉成，所以拒不增援。结果鲍超被困 20 多日，几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重蹈李续宾三河镇的复辙。

正在太平军围攻鲍超之时，胡林翼突然派金国琛、余际昌率兵 1 万多人从太平军背后袭击，鲍超趁机率部从城内杀出，陈玉成腹背受敌，自顾不暇。多隆阿见状，立即派兵烧毁陈玉成的粮库。这样一来，陈玉成于 1860 年 2 月 16 日不得不放弃太湖，连夜撤走。

太湖是安庆的门户，门户一开，湘军便长驱直入。这时的安庆只剩下枞阳一线与桐城相通。曾国藩后来利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韦俊，这位曾经两次攻克武昌的骁将顿时成了太平天国的罪人。1860 年 6 月，韦俊在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的配合下攻陷枞阳。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眼前。

曾国藩有意要成全曾国荃，命他带领曾家军的嫡系部队进驻集贤关，兵临安庆城下，形成围攻之势。从此，安庆内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处在了湘军严密的包围之中。

4. 总督两江

正当曾国藩全力围攻安庆的时候，天京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859年，拜上帝会的最早成员之一，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此时正感到身边无人，洪仁玕的到来令他万分高兴，遂封为千王，总理朝政。1860年初，为解天京之围，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太平军将领策划了一场大的军事行动。李秀成率兵由苏南入浙，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援。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2万，由江宁赶赴救杭州。张玉良刚走到半路，李秀成突然率兵北上，猛扑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也率兵强渡长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将江南大营紧紧包围起来。和春、张国梁拼死抵抗，九昼夜的激战过后，江南大营彻底瓦解。和春、张国梁仓皇逃出，太平军乘胜追击，接连攻下苏州、常州。和春自缢，张国梁落水而死，江苏巡抚徐有任自杀，两江总督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一时形成树倒猢猻散的局面，江南7万绿营全军覆没。清政府在南方的绿营武装已基本瓦解，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对天京的包围了。

江南大营的覆灭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湘勇出力，绿营兵坐收渔利的想法彻底破灭，从此只得一心一意依靠湘军剿灭太平天国了。

消息传来，曾国藩集团欣喜万状，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无不倍感欢欣鼓舞，以为自己的出头之日已到。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原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走之后，咸丰一怒之下将其革职。后来由肃顺推荐，咸丰皇帝下诏令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速往江苏，署理两江事务。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认为要想剿灭太平天国，就必须依靠胡、曾这帮汉人。所以无论是曾国藩，还是胡林翼、骆秉章等汉人之所以能够得到皇上重用，都与肃顺的极力保荐分不开。曾国藩第一次墨经出山就曾深得肃顺的推荐，现在又仰仗他登上两江总督的宝座，这对于苦于得不到抚督大权而苦恼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是莫大的恩典，因此，曾国藩从心底感激肃顺。然而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一时的冲动与肃顺有任何私下联系。后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肃顺时，从肃顺家中搜出许多阿谀追随的信件，其中独独没有曾国藩的，这使慈禧大为感叹。因此，曾国藩在慈禧掌权时期，仍能得以重任。

就在曾国藩总理两江不久，胡林翼又上奏皇上，保奏左宗棠。

左宗棠本来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充任幕僚，很得骆秉章的信用，骆秉章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每次骆秉章的部下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令其问“左师爷”去。因此，湖南官场对左宗棠是惟命是从，敬若神明。左宗棠本来就恃才傲物，狂妄自负，这一来就更加目中无人。有一次，署理湖南提督、永城镇总兵樊燮找骆秉章议事，向骆秉章行完礼后，见左宗棠也在座，于是就向他行了一揖，问了声“左师爷好”，然后落座。左宗棠见樊燮未向他行跪拜大礼，心中极不高兴，厉声责问樊燮说：“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

要请安，你为何不向我施礼请安？！”樊燮也怒了，大声反驳道：“朝廷体制并未规定武官要向师爷请安。武官虽轻，也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一个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一时语塞，驳然大怒，破口大骂，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去将樊燮痛打一顿，幸好被骆秉章拉开。打过樊燮之后，左宗棠还气愤不过，又以骄倨的罪名将其革职。樊燮以一堂堂二品武职大员的身份竟被一个举人如此侮辱，如何能忍受！立即上诉于湖广总督官文，添枝加叶地把左宗棠如何无视朝廷命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情形向官文诉说了一遍。官文对左宗棠早就不满，趁机向皇上上了一个折子，将樊燮所说的罪状罗列了几条，又给左宗棠戴了一顶“劣幕”的帽子，说他把持湖南，为非作歹。

咸丰看到官文的折子，立即派人前去核查此案，倘若真有不法之事，将左宗棠就地处决。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立刻慌了手脚，一边出面奏保，一边在京城活动，请肃顺出头保荐。肃顺说必须有内外大员的保奏，皇上问起时才好说说，一时间，保荐左宗棠的奏折雪片般地向咸丰飞来，以至于有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称赞之辞，肃顺也乘机推荐，左宗棠不仅性命得以保全，而且赏给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职位，同时又有了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支持，曾国藩站在与太平军作战最高统帅的高度，开始思考以后的用兵计划。

首先他清醒地意识到朝廷从江浙入手，通过苏州、常州包围天京，从天京下游进攻的决策是行不通的。要想攻克天

京，必须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包围，即继续执行自己复出时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拿下安庆，消灭陈玉成的部队，步步进逼天京。所以他拒绝了清政府让他率兵攻下苏州、常州的要求，只把大营扎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之间的祁门，一心一意围攻安庆。

5. 拒不北援

正当曾国藩大权在握，以为可以一展夙愿，顺利攻克安庆，进逼天京之时，北京一场意外的变故，又将曾国藩拉入难以自拔的焦思苦虑之中。原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带领嫔妃、大臣仓惶出逃，严令曾国藩派鲍超赴京救驾。

英国侵略者通过 1840 年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了大量特权后并不满足，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权，自 1854 年就开始提出修改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侵略者便和法国勾结起来，于 1856 年 10 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他们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断挑起战争，其间前后共延续了四年。1860 年 8 月，他们从北塘登陆，打败了僧格林沁的骑兵，攻占天津，后来又击败胜保的部队，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大惊，慌忙带着一班大臣妃嫔逃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在京师与英法谈判。同时，接受胜保的奏请，在逃往热河的途中，接连发布上谕，令各地抚督、将军迅速带兵来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谕就是发给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要他速派鲍超率兵两三千人，“兼程前进，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一面为皇上蒙尘而担忧，一面又对派鲍超救驾而犯难。

当时曾国藩的处境也不好。太平军刚好攻克徽州，曾国藩孤守祁门，自身凶吉未卜，他还要靠鲍超保卫祁门，扫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发兵北援？但假若拒不发兵，这又是皇上的圣旨，抗旨之罪，谁能担当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轻，更何况这又是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时，抗旨不发兵，自己平时口口声声标榜的忠君爱国，岂不都成了假话？万一到时皇上震怒，天下共责，不待杀头灭族，自己就早已身败名裂，万人共诛了。

因此，面对这道圣旨，曾国藩落入了进退不是，左右两难的境地。

于是他急忙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议，又命幕僚们献计献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愿派鲍超北援。鲍超是湘军中有名的能征善战之将，他所率的霆字营是湘军围攻安庆所剩的最为重要的一支机动兵力，并且是惟一敢与陈玉成对抗的军队，倘若将他派走，势必影响安庆战局，何况他们也不愿意将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军队送给屡战屡败，草包一般的胜保率领。然而，北援毕竟又事关勤王之举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假如托词推诿、拒不发兵，不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仍想不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曾国藩的幕僚们也都主张北援，全无上善之策。曾国藩一连几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不能入睡。

就在曾国藩苦思焦虑不得善策的时候，李鸿章悄悄地走进了曾国藩的房内。首先他告诉曾国藩，此时入京勤王，已属空话，对皇上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好处。洋人进逼北京，并非是想对皇上不利，他们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战争取得在华的更大利益，只要许给他们好处，肯定自行退兵。接着又献计说，鲍超为一介武夫，不能担此重任，入京勤王之事，必须曾国藩、胡林翼两人中的一个带兵前去。而这样的事，自己又不敢确定，因此上折请皇上定夺。这样，从祁门到北京，奏折最快也要半个月，一来一回，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协议，到那时，勤王一事，肯定无人再提。

李鸿章短短数语，一个小小“按兵请旨”的妙策，攸地把困惑了曾国藩几天的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是的，一个月之内，恭亲王奕訢必能和洋人谈妥退兵的条件，到那时，入京勤王一事早已成为过丘之水，曾国藩一阵轻松。李鸿章如此轻松地提出了这个万全之策，从此更受曾国藩器重。

事情果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于10月18日上书咸丰，请求降旨任命由谁带兵入京，11月16日接到皇上圣谕，说“和议”已成，鲍超、胡林翼、曾国藩均毋庸北援。

《北京条约》的签定，是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每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人，包括左宗棠在内无不痛心疾首，而曾国藩却大不相同，他一接到达成和议，毋庸北援的圣谕，立刻大喜过望，认为自己又可以专心致力于剿灭太平天国一事，真是万幸之极。

北援一事，只不过是曾国藩围攻安庆期间的一个小插曲。这件事本来就只是一场虚惊，并未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但他

却像一面镜子，使世人更加清楚地看清了曾国藩的真面目。他置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于不顾，一心只盼清政府早日与侵略者签订和约，只要不让他北援，能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牺牲任何民族利益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在这场闹剧中，李鸿章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第一次显示出了他出色的卖国“才能”。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推荐和保举下，步步高升，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使他的卖国才华有了更大的施展余地。

6. 困守祁门

曾国藩选定祁门作为驻节之地，主要是看中它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然而等他到祁门，见四周山势陡峭，与外界相连的仅有那条连接休宁、景德镇的东西官马大道。除此之外，有一条小路勾通北面的两个小镇：大赤岭、大洪岭；另外有一条小河，河面狭窄，只能浮起坐两三个人的小船，大船不能进来。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倘若东西方向的那条大道被堵，祁门与外面的联系即断，县城则陷于绝境。看到这些，曾国藩有些后悔了。但驻守祁门的事已上报朝廷，所以只得暂时驻下。

跟随曾国藩驻扎祁门的众幕僚一见祁门地形，纷纷劝他离开祁门，另觅合适之地，曾国藩拒绝不听。李鸿章也跟着到了祁门。他在祁门四周勘察了一番，也劝曾国藩说祁门地势形同釜底，是兵家绝地，要他迁居别处，以免将来受困，曾

国藩执意不听，一意孤行，还大骂要走的人贪生怕死，从此，再也无人敢提离开祁门的话。

1860年12月1日，当曾国藩还在为北援问题惴惴难安的时候，李秀成忽然率领二次西征军的主力部队进入皖南，并攻破羊栈岭进克黟县，距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80里路，而且中间没有任何遮阻。这时曾国藩身边只有3000防兵，情形十分危急。曾国藩大惊之下，急忙调鲍超前来援救。

几天之后，援军未见踪迹，曾国藩自料难逃活命，这才后悔没听李鸿章等人的话，以至铸成今日大错。于是写好遗书，交待了一些后事。祁门大营的纸上谈兵的军机参赞们，舞文弄墨的书记文案们，以及计账算数的小吏们，此刻也都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些胆小怕死的人瞒着曾国藩，偷偷从外面买来几条小舟，将自己的行李物品都收拾好，一包一包地都放在船上，单等着曾国藩兵败以后逃命。曾国藩见状，恨不得将那些蛊惑军心的人都抓来杀死。然而他冷静地一思考，觉得那样做只能使人心更散。于是心生一计，欲擒故纵，贴出一份告示，说对愿意离开祁门的人，可以发给工资和路费，决不强留，单等祁门之险过后，愿意回来的仍可回来，曾国藩将以诚相待，不计前嫌。这一招果然奏效，如此一来，那些准备走的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又偷偷地把船上的东西搬回。就这样，曾国藩表面装作很平静的样子，与众幕僚提心吊胆地苦苦支撑。

不久，鲍超率部来援，将李秀成击败。李秀成一战失利之后，随即撤兵南下，曾国藩又一次死里逃生。

这一场惊险过后，曾国藩稍微稳定下来，便向导致这场

祁门之灾的“罪魁祸首”李元度算账。

李元度是曾国藩最早的幕僚之一，在曾国藩几次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甚至一些老朋友都要离开他的时候，李元度始终不渝与曾国藩同甘共苦地过了六七年的艰苦岁月。对这些，曾国藩曾经很感激李元度，甚至有“三不忘”之说，即靖港惨败后对曾国藩细心慰护；九江惨败后率领平江勇护卫水师，保护大营；樟树镇惨败后，独立支撑到援军赶到。因此，李元度无论对曾国藩，还是对湘军，都起过巨大作用。

但李元度擅长文学却不擅带兵，对部下更是任人唯亲，一味放纵，他所领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只是由于曾国藩对他心存感激，徇情袒护，所以李元度才一再得以重用。

这次曾国藩进军皖中，仍保奏他为徽宁池太广道，带兵驻守徽州，为自己把守祁门的门户，从中足见曾国藩对他的重用。但曾国藩也深知他不会带兵打仗的底细，因此，驻守徽州之前曾一再告诫他，遇到太平军攻城，只可固守，绝不可出城迎战。但李元度却将曾国藩的告诫视如儿戏，根本不放在心上。当李世贤率太平军进攻徽州城时，他轻率出城迎战，后来见湘军情势不妙，又率先逃跑，至使全军奔溃，徽州失守，危及祁门。李元度逃走之后，又不及时返回大营，而在浙江、江西边境犹豫徘徊，数月不归。最后回到大营之后，又不束身待罪，反而理直气壮地向粮台索要欠饷，等到饷银拿到手，李元度一言不发，径自率兵回湖南去了。

李元度这种目无军纪的行为使曾国藩大为恼怒，同时又无比失望，决心参劾李元度。谁知参劾李元度的折子还没拟好，知情的幕僚和文武参佐们纷纷进来为他说情，说曾国藩

这样做太绝情绝义，不顾前情了。其中李鸿章的反对尤为激烈，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如果一意孤行参了李元度，会让湘军全军将士寒心。但曾国藩为了表现自己不徇私情，赏罚严明，对众人的求情一律不允，坚持不让步。李鸿章见自己求情不下，又遭曾国藩训斥，随即告辞，离开曾国藩的幕府，扬长而去。

其实李鸿章早就不想在祁门呆下去了。他是个机敏异常的人，从刚到祁门的那时候起，他就知道驻扎此地是一个绝大的军事错误，这次太平军围困祁门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另外他也清楚地看到，太平军绝不会甘心这次的失败，倘若再来一次包围堵截，祁门一定会被连锅端。李鸿章有自己的一番远大抱负，他只能依靠老师同上青云，而不愿与老师共存亡，现在正给了他一个离开祁门的绝好时机，因此，李鸿章趁机溜掉。

果然，没过多久，太平军又分三路向祁门攻来，曾国藩四面楚歌，再一次陷于惊恐之中，可惜这次太平军主将黄文金在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时，不幸负伤，只得退回皖南。然而，渡过这次危机不久，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先是李世贤从江西婺源向左宗棠部展开进攻，1861年3月又击败王开琳部，迫使湘军退回景德镇。与此同时，刘官芳等人又进攻出入祁门的交通孔道历口，距曾国藩大营仅20里路。曾国藩又一次惊慌失措，急忙派兵增援。刘官芳退军。曾国藩刚想出一口气，江西方面又传来噩耗：李世贤攻破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内外隔绝，又一次濒临绝境，只得移驻休宁，并派兵攻打徽州城，企图从这

里打开一条能往浙江的粮道，以求死里逃生。然而此时湘军已乱，不听指挥，根本无法组织起攻势。接着，太平军又跟踪而至，追到休宁，曾国藩无奈，只得又退回祁门。此时，曾国藩再一次到了绝望的顶点，再次写好遗书，安排后事，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称这次境遇与几年前湖口惨败的情形相仿。

恰在此时，李世贤在乐平与左宗棠交战失利，于是放弃景德镇，东走浙江。湘军的粮道恢复，曾国藩再一次逃了活命。这一次对曾国藩的打击很大，从此之后，无论多么重要的战事，曾国藩再也不肯亲临战场督战指挥了。

自兵驻祁门以来，曾国藩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时时感到危机四伏，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因此，自进攻徽州溃败之后，再也不敢逞英雄，硬充好汉在祁门呆下去了，乘左宗棠乐门取胜，军情稍有好转之机，立刻顺坡下驴，赶紧离开祁门这一险地。后来移驻东流，把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至此，曾国藩才放下心来喘口气，再也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7. 攻陷安庆

因为安庆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太平天国的命运，所以，安庆战场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领导集团的极大关注。安庆被围之后，洪秀全立即召陈玉成、李秀成回京，和洪仁玕共商解安庆之围之大策。

洪仁玕虽然从未带兵打仗，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但他毕

竟是个见过世面的饱学之士，看问题的眼光要深远得多。因此，他提出要解安庆之围，必须用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现在曾国藩将主要兵力放在安徽，胡林翼也率领湖北绿营的主力驻扎在英山一带，守卫武昌城的是那个只会做官，不会打仗的湖广总督官文。因此，曾国藩、胡林翼的后方空虚，如果派兵攻打武昌，曾国藩等人肯定会不顾一切回援，因为湘军的粮草辎重之物都全靠从武昌用船运送，夺回武昌就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围攻武昌，曾国藩、胡林翼必从安庆撤兵，安庆之围不解自破。

洪仁玕是有军事眼光的，围魏救赵的确是当时解安庆之围惟一正确而有效的办法。但陈玉成、李秀成在执行这一策略时都犯了一些错误，致使这一策略没有坚持到底，最后终于破产。先是陈玉成在兵临武昌时，轻信了英国一位海军中将的话，轻易地放弃了攻占武昌的打算。后来听说安庆危急，又急忙率部回援。这样，陈玉成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本来可以一举攻克武昌城，谁知功亏一篑，放弃了这次出兵的既定目标。

接着是李秀成。李秀成本来就不愿放弃富庶的江南地区远攻武昌，因此，出兵伊始他就对援救安庆抱着消极态度。出兵西进以后，李秀成一路东躲西闪，招兵买马，行动非常迟缓。当陈玉成兵临武昌、汉阳之时，他还在江西境内徘徊。后来见陈玉成退兵，他趁机立刻停止前行，率部东归。围魏救赵一事就这样瞎折腾一番后不了了之。

就在太平军实施围魏救赵的计划时，曾国藩也展开了对安庆的攻势。

围住安庆的湘军主要是曾国藩的嫡系部队，由曾国荃率领。对于曾国荃，曾国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企望他能攻下安庆，显身扬名，曾国藩甚至告诉曾国荃，把围攻安庆当作是围攻天京的军事演习。曾国荃也不负他的厚望，一年多来，硬是壕沟营房，把安庆围得死死的。

太平军守城有个规律，那就是“守险不守陴”，把那精兵良将都放在城外地势险要的地方，而真正负责守城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之人。安庆城外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城北门外的集贤关，一是菱湖石垒，如果攻破这两个地方，安庆就成为一座孤城，不攻自破。

陈玉成回师救援安庆，驻兵集贤关。陈玉成一边加固菱湖的防守，一边用小船通过湖水向城内运送粮物，这样就稳定了安庆的形势。随后，陈玉成为了打破曾国藩对安庆的包围，向其围城军发起了几次攻击，但都没有成功。连战几昼夜之后，陈玉成见仍毫无进展，遂留兵 8000 驻守集贤关及菱湖两岸各垒，自己则率领一部分人马退回桐城，找洪仁玕共商破敌之策。

曾国藩一见陈玉成退走，顿觉有机可乘，立刻将鲍超、成大吉两部调至集贤关外，对守在那里的太平军猛攻。

驻守集贤关的主将是刘玲琳，他的部下是以广西老兄弟为骨干的精锐之师，是陈玉成全军的中坚力量。陈玉成以往东征西战，所向无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刘玲琳之力。曾国藩也久闻刘玲琳的大名，为表示敬畏之心，他甚至在书信中称刘玲琳为“玲翁”或“玲琳先生”，并特别注明：“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在围攻刘玲琳部时，他还反

复告诫鲍超等人，一定不能让刘玲琳一人逃脱。

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集贤关被湘军攻破，刘玲琳将士大多壮烈牺牲，刘玲琳率一部分人突围而出，但又遭湘军水师炮船拦截，最后全部遇难。占领集贤关的同时，曾国藩又命湘军向菱湖两岸的石垒进攻，不久，那些石垒也陆续被攻破，安庆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曾国荃见状，加紧攻势，又不断在城墙下平挖地道，准备用炸药轰城。9月5日，曾国荃部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城内守城的太平军将士此时早已饿得举不起刀枪了。

进入安庆城以后，曾国荃充分发挥其“老饕”的特点，在曾国藩的默许下，开始了惨绝人寰的烧、杀、淫、掠。曾国荃将英王府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全部装上船只，运回荷叶塘的家中。

攻陷安庆以后，咸丰得报，赏曾国藩太子少保衔，赏曾国荃布政司衔。从此，曾国藩势气大增，湘军展开全面攻势，太平军转入战略防御，直至天京陷落。

七、攻陷天京

1. 三路进军

攻下安庆之后，天京上游要塞尽失，它所依靠的只有下游的苏、浙一带。曾国藩将他的两江总督的衙门由东流搬至安庆。从此，曾国藩将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天京之上。

就在曾国荃攻陷安庆前的半个月，即 1861 年 8 月 21 日，咸丰皇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临终前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帮助当时仅有 6 岁的皇帝载淳执掌朝政。不久，载淳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处死了肃顺、载垣、端华，其他顾命大臣也都分别被革职或流放，同时，将载淳皇帝的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政变发生两个月后，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本来就很敬佩恭亲王奕訢的才能，对他的对外投降政策称赞不已，而对肃顺虽然心存感激，但不满于他的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所以此时听到政变的消息，先是一惊，随即又欢欣鼓舞起来，对发动这次政变的那拉氏慈禧和恭亲王奕訢赞不绝口，说朝廷

从此以后“人心思治，自是中兴气象。”

慈禧的听政，的确给曾国藩带来福音。慈禧因为在搜查肃顺家时，没有发现曾国藩和他有勾结，因此对曾国藩极为信任。1861年11月，她下诏任命曾国藩管辖苏、浙、赣、皖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其节制，同日，又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沈葆楨为江西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在此前后，又任命委派了一批汉人官吏，这样，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渐渐归于以曾国藩为首的军阀政客集团的掌握之中。

在那拉氏政变的鼓舞下，曾国藩对太平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决心分兵三路进逼天京，一路由左宗棠率领进攻浙江地区，一路由李鸿章率领进攻江苏的苏州、常州地区，为了独占头功，最后一路派曾国荃率兵直取天京。

1862年2月，左宗棠率湘军六七千人开进浙江，攻占了遂安、衢州、金华等一系列城镇，后来又与英、法等反动武装相勾结，步步进逼，使太平军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1863年9月下旬，左宗棠的湘军与德克碑率领的常捷军攻陷富阳。1864年3月底，左宗棠占领杭州。

就在左宗棠入浙两个月左右后，曾国藩又派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率领新建立的淮军援救上海，攻取苏州、常州。

李鸿章又是怎么回到曾国藩身边的呢？原来在李鸿章因为替李元度求情遭到曾国藩的严辞拒绝后，一直在江西游荡，既找不到另可投靠的人，又不敢回去再见曾国藩。后来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见李鸿章无事可做，便建议他再去投奔曾国藩。李鸿章后来见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厚着脸皮，第二次

投奔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虽然恨他临危逃脱，置自己于不顾，明知他不是个能与自己共患难之人，但一来二人有师生旧情，二来李鸿章又实在乖巧难得，是个人才，现在见他仍念旧情，没有另投别人门下，便欣然将其留下，仍然委以重用。

曾国藩本想让李鸿章从镇江出发，穿过太平军的控制区，由陆路开赴上海，但李鸿章不乐意。最后，上海会防局的官绅与英国人商定，以 18 万两白银雇英国轮船 7 艘，分三次把淮军由安庆运到上海。

1862 年 4 月 8 日，李鸿章率领第一批准军先行抵达。到了上海之后，李鸿章很快和英国侵略者的头子戈登勾结起来，和他率领的“常胜军”相配合，以上海为基地，对太平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从 1862 年到 1863 年 12 月，先后攻陷了奉县、金山、嘉定、常熟、苏州等地。

1862 年 4 月，曾国荃率领他围攻安庆以后重新招募的湘勇及旧部 1.8 万人，联合曾贞拔部下四五千，总兵力 2.3 万，从安庆沿江东下，直指天京，一连攻克芜湖、巢湖、无为、运漕、和州、太平府。5 月 28 日，曾国荃乘胜夺取天京南路要隘秣陵关，直逼天京城下。5 月 31 日，曾国荃驻军雨花台，彭玉麟水师也进泊护城河口，天京又一次被包围了。

然而，曾国荃急功冒进，不待其他各路援军到来，自己孤军深入，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忧虑。于是，曾氏兄弟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进兵与退兵的争论。

2. 进退之争

曾国藩在制定围攻天京的作战计划时，采取的仍是围攻安庆时围城打援的老办法。即由曾国荃担任围城的主攻部队，其他鲍超、多隆阿、李续宜分别率领三支人马为游击之师，负责阻截太平军的援军。谁知四路人马的进展很不平衡。

曾国荃接受了主攻天京的任务之后，和曾贞拔一起率领2万多人马雄心勃勃地向东开进。由于攻下安庆时这支队伍里的将士们都不同程度地发了财，现在听说天京城内的金银财宝比安庆城内还要多，因此一路过关斩将，人人奋勇，都想早日攻下天京，再发一笔横财。而其他三支部队的积极性却没有如此高，因为即使攻下天京，他们所得的好处也不多，所以行动缓慢，当曾国荃的部队驻扎到天京城下的雨花台时，鲍超的部队被太平军阻在宁国，李续宜的部队受阻于寿州，多隆阿虽已攻陷庐州，本可挥师东进，但却又按兵不动。所以四路人马会合天京之说，实际上变成了曾国荃的孤军深入。其中最为糟糕的是李续宜刚出师不久，就接到其父亲去世的消息，回家奔丧去了，多隆阿后来又被调到陕西，如此一来，合军天京已近流产。

曾国藩见到这种情况，在安庆急得日夜不安，急令曾国荃退兵，但曾国荃执意不肯，曾国藩无奈，只得令他筑垒自固，等待各路援军到来。同时又督促各路军马加快行速，迅速到天京城下与曾国荃会合。

正当曾国藩在安庆忧灼万分，夜不成寐的时候，一场瘟

疫开始在围攻天京的各路湘军中蔓延开来。仅仅几天时间，湘军就死去 300 多人。一个营房里，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便会立即扩散开去，早上看着还是活蹦乱跳的人，晚上就僵卧不起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给湘军带来巨大灾难，就连曾贞毓也染病身亡。噩耗传到安庆，曾国藩伤悼不已。

就在这时，李秀成又趁机大举向雨花台进攻，曾国荃不得不率领病羸士卒迎战，本就被瘟疫弄得痛苦万状的曾国荃，这次更是雪上加霜。李秀成率领主力部队与曾国荃在雨花台大战了 46 天，战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曾国荃部尤甚。但李秀成见久攻无效，遂轻率撤兵，这样曾国荃从濒于全军覆没的边缘上得以解脱出来。

在这段时期，由于曾国荃孤处雨花台，连遭不幸，曾国藩日夜心神难安，焦灼万分，动不动就向部下发脾气，有时甚至半夜起来在室内彷徨不已，不能自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他到处调兵，写信给李续宜，请他墨经出师，而李续宜自己也病入膏肓，不能应命。曾国藩又命李鸿章将原属曾国荃指挥的程学程部 2000 人调回雨花台，但程学程打仗勇猛，李鸿章正倚他如长城，坚决不放，只同意将吴长庆刚刚招募的几营新兵调去。

经过这场惊吓，曾国藩的胆子更小，所以在李秀成刚刚露出要撤兵的迹象时，又一次命曾国荃退兵。谁知曾国荃仍不为所动，坚守雨花台，一步也不肯后退。曾国藩无奈，最后决定亲自到雨花台大营走一遭，视察一下前线各营的情况，然后再酌情处理。

1863 年 3 月 18 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前后花了近一个

月的时间，亲自检查了曾国荃的大营和滁县、和州、无为等地的湘军营地壕墙，认为围攻天京的湘军各营盘坚固，各部之间关系协调，逐渐放了心。再加上曾国荃据理力争，认为李鸿章和左宗棠不久就能控制住江苏和浙江的局面，到那时李秀成必定自顾不暇，天京粮饷一断，迟早会成为一座孤城，自己陈兵雨花台，将来攻破天京的首功自然就是他的，无人再敢与他抢功。曾国藩一听有理，从此再不提要他退兵的话。

但曾国荃用来围攻天京的兵力最初是 2.3 万人左右，经过一场瘟疫和大战后，人数就更少了。天京到底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其规模、面积远比安庆等城大得多，以曾国荃目前手中的兵力，要想像围困安庆那样包围天京，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围困天京兵力不足的问题，曾国藩陆续增募新勇，使曾国荃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 3.5 万人。同时，曾国藩又把李续宜的部下萧庆衍部及叛徒韦俊等军 1.5 万人调到天京城下协攻。这样，曾国荃就再不感到势单力薄了。接着，曾国藩又调鲍超率兵攻占江浦，随又与水军联合攻陷九洲洲。这样，天京与下游联系的惟一通道和粮食供应线即被切断。

3. 血洗天京

从 1862 年到 1864 年，曾国藩三路出兵，除曾国荃围住了天京以外，其他两路李鸿章、左宗棠也都很快速占领了天京周围的重要城镇。这样，天京遂变为一座被湘军严密包围的孤城。

由于天京局势危急，1863 年 12 月 20 日，忠王李秀成应

洪秀全之命到天京负责守城。由于他经验丰富，恪守职责，率领太平军在粮食、弹药供应不足的艰难条件下，粉碎了曾国荃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曾国荃久攻不下，心急如焚，好像一只饿猫眼见一块肥肉却吃不到口一样，着急但没用。

见到这种情况，曾国藩也是忧心忡忡。他既想让自己这个心高气傲的弟弟单独攻下天京，抢个头功，那样的话不仅他能受到皇上重赏，曾家脸上也有光彩。但又怕弟弟一人兵力单薄，围城又有什么闪失，假如久攻不下，反被城中的洪秀全、李秀成击退，自己十几年的心血岂不白费？功亏一篑是自己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曾国藩很想派兵增援弟弟，早日将天京拿下，以酬夙愿。

曾国藩深知九弟的脾气，从安庆出兵的那时候起，曾国荃就想独占头功，不愿有任何人插手围攻天京一事。多隆阿率部远征陕西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后来鲍超、杨载福等部都曾参与过围城，但终于又都先后离去，也是这个原因。其间还有几起奉命前来协攻的部队，也都被曾国荃拒绝。说实话，曾国藩也不想外人来分一杯羹，他也想自己兄弟独吞天京这块肥肉，早就听说天京城内金银堆积如山，天王府都是用金子造的。但天京已围了一年多了，仍不见丝毫进展，曾国藩心里很着急。最后，他终于决定让李鸿章前去相助曾国荃。

曾国荃由于在攻破安庆时尝到了甜头，这次他是铁了心的要独占攻陷天京的头功和天京巨富。当他获知李鸿章的淮军就要来助攻天京时，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手下的将士们，为了煽动起他们攻城的积极性，曾国荃厉声问其部下：“有人要来抢功了，你们答应吗？”曾国荃手下的那帮将领、士兵，

对天京城内的财富也是垂涎已久，现在听曾国荃这么一说，立即大骂李鸿章，表示要齐心协力，在李鸿章到来之前攻破天京。

曾国荃见状大喜，立即组织人马攻陷天京城外的地堡城，撤去了天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接着又组织人力，在天京城下猛挖地道，日夜兼工，轮班开挖，1864年7月18日，地道挖成。

曾国荃摆出破釜沉舟的架势，亲自坐镇天城堡指挥，决定第二天通过地道炸城，下令退者即斩，最先入城者记头功。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下令点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靠近太平门一带的城墙出现一个20多丈宽的缺口，一时烟焰冲天，抢先冲向缺口的400多名湘军全部死于烟尘之中。缺口两边聚集着数千名太平军将士，一时间炮弹、枪子、石块、刀箭都向缺口处飞来。湘军此时早已杀红了眼，呼啸一声，不顾前面危险，踏尸而过，乘机涌入城中。

天京城一下子变成了血与火的战场，冲入城内的湘勇与太平军在城里到处展开了肉搏战，大街小巷，尸横遍地，湘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湘军疯狂了，太平军也疯狂了。

湘军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掠。他们一进城就放火，以火当武器，所以湘军攻到哪里，大火便烧到哪里。到傍晚时分，全城已变成一片火海。

湘军变成了强盗。他们杀人，杀太平军将士，杀城内居民；他们抢，抢王府，挖地窖，也抢老百姓的财物；他们烧，烧主要是为了掩盖罪行；他们还肆意奸淫妇女，掳掠妇女。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参加攻城的每个湘军军官和士兵，上至曾国荃，下至无名小卒，全都发了大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曾国荃更是“老饕”之名满天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天京不复存在了，太平天国也在这场炮火中作了历史性的永诀，六朝金粉，秦淮名胜，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加进了更为沉重的历史内涵。不以成败论英雄，天京陷落了，太平天国灭亡了，可是谁能否定得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曾经掀起过惊天动地的巨浪！谁能否定得了，在中国文明的史册上，他们曾经建立起一个迥异常制的王朝！又有谁能否定得了，太平天国的将士们都是掌握自己命运、渴望平等自由、敢于跟强大势力作对的英雄豪杰！

4. 殊荣奇忧

攻克天京，曾国藩兄弟功勋盖世，为了显示天恩浩荡，天京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班功臣们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将领也都有爵、尉封赏不等。汉人封侯，清朝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说是旷古无有的殊荣，曾国藩对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荣背后，清醒冷静、目光深邃的曾国藩还是

看到了自己危机四伏。

曾国藩出身贫寒，只是汉族的一个中小地主身份，这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他之所以后来能平步青云，跻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举荐和提携。道光皇帝死后，穆彰阿被罢，曾国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个咸丰年间，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创建湘军之初，就不断受到某些大臣的攻击，在攻克武昌之时，又失巡抚一职，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他梦想的封疆大权，致使处处碰壁，心灰意冷，几乎愤然不问世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瓦解，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掌权以后，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迅速扩军，其嫡系部队由2万速增至5万，各路湘军总数30万人，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就有12万之多，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历代君王都是如此。

其实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的曾国藩也不是没有想过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赵匡胤，但就条件来说，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他当时都不具备。首先是政治上，他虽然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获得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但其威望远没有达到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其次在军事上，虽然眼下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地占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都环伺四周，

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只要湘军稍有反叛端倪，他们便会四面包围，还有湘军内部的左宗棠、沈葆楨等人，位列督抚，战功显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又竭力笼络，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湘军的目的。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的关系亲密，但他对曾国藩并非一片愚忠，他只会与其共荣，不能与其同辱，一旦曾国藩起兵，李鸿章只会按兵不动，坐观战局，一有不利，立刻便会倒戈。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比谁都清楚。尤其是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即使起兵能侥幸成功，黄袍加身，也难保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曾老九不会做“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赵光义。

因此，考虑再三，权衡得失，曾国藩只能走自剪羽翼的道路，以清除清政府的戒心，保住自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裁撤了一部分湘军，其次又奏请朝廷停解厘金，接着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三项围绕兵、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清政府的戒备，缓解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

这样，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自己嫡系 5 万人裁撤一半，仅留下 2 万人驻金陵（天京，今南京）、芜湖、金柱关等地。为了重振封建教化，笼络江南士子，曾国藩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举行乡试，得到了江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

八、剿捻失败

“捻”是康熙年间以来一直存在于民间的群众反清集体，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由于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活动一直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们大受鼓舞，乘机而起，在各地组织军队，发动起义，反对当地贪官酷吏的暴政，杀富济贫，成为太平军的忠诚盟友。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捻军也闻讯沮丧，军心动摇，组织涣散，濒于瓦解状态。僧格林沁和官文乘机进攻，捻军的主力部队被歼，只剩下两支小队伍，一路退到陕西南部，一路在赖文光的领导下转战于湖北、河南等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给清政府以极大威胁。

赖文光，广西人，1851年跟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刚开始他只当文官，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他弃文从武，开始带兵打仗，隶属于陈玉成部下，后来在太平军围魏救赵的计划落空后，他逐渐成为西征太平军和捻军的最高领导人。赖文光文武兼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很快将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为代表的蒙城、亳州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吸收了一部分兵败后的太平军将领，组织了新的领导集团，结

盟发誓，为恢复太平天国而战。赖文光总结了捻军和太平军各自的优缺点，重新整编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采取大规模运动战对付清军，并在战斗中大量获取敌人的马匹、装备，逐步改步兵为骑兵，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改编后的捻军，连骑逾万，急如狂飙，组织严密，作战灵活，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剿灭这支劲旅，清政府先派僧格林沁率部围剿。僧格林沁乘着蒙古贵族的虚骄之气，以为很快就可将捻军消灭，于是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捻军利用他急于求成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只是每天行军一二百里，拖着他兜圈子。僧格林沁又一心想与捻军作战，早日将其消灭掉，于是日夜行军，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路。捻军因为行动迅速，所以走走停停，故意挑逗清军，僧格林沁大怒，日夜追击，疲惫不堪。刚开始还能精神抖擞，后来就累得连马缰绳也举不起来了，只得在脖子上挂条布带子，把手臂吊起来，以便驭马。有时僧格林沁连饭都来不及吃，饿了就喝几口随身带的酒，继续追赶。

僧格林沁尚且如此，其他将士们就可想而知了，步兵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他们用两条腿跟在马匹后面跑，有时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不少人被拖死，累死。

就这样，赖文光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消磨清军的斗志，将他们胖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僧格林沁步兵掉队，骑兵离散，他自己则率领少数精锐骑兵脱离大部队，死死追踪。捻军抓住时机，布下天罗地网，将僧格林沁的部队一举歼灭，其本人也被当场击毙。

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清政府极为惊恐。他们本想让僧格林沁单独将捻军镇压下去，以提高蒙满贵族的威望，以对抗新起来的湘系、淮系地方汉族军阀，但后来见僧格林沁无力镇压捻军，又想故技重演，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力，僧格林沁坐收其功，但僧格林沁狂妄自大，愚顽不化，根本看不起曾国藩这帮汉人，对清政府的好心力加排斥，清政府只好作罢。现在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了，清政府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曾国藩此时已经54岁了，功成名就，位列甲侯，再也没有10多年前那种功名之心了。但皇命难违，只好受命。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2万多人北上。9月23日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

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军进行拦截和追击。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革命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方法，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1866年9月，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清政府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

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清政府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

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

九、悒郁而死

1. 中兴幻想的破灭

早在曾国藩年青的时候，就幻想通过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再振生机，重新恢复康熙、乾隆时代的太平盛世。后来发现此路不通，转改编练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并大力整顿吏治、漕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企图通过另一条道路实现“中兴”的目标。

开始，军事上连遭失败，政治上处处失意，他心灰意冷。复出山后，军事形势大为好转，清政府又授予了他地方实权，曾国藩大受鼓舞，对清王朝的前途充满希望，以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大有一番作为，帮助清政府走上中兴之路，于是，“中兴”一词便成了他的口头禅。

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惩治了一批逆臣贼子，国家必可兴盛。不料，太平军刚镇压下去，捻军又声势大振，不得已又得奉命北上前去镇压。现在捻军也被镇压下去了，按曾国藩的设想，接着出现的应是所谓的太平盛世了吧，至少也应该是一片生气勃勃的复兴景象。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呈现在曾国藩面前的完全是一幅败落景象，看不到任何振兴的苗头。

任两江总督以来，曾国藩也曾在江浙一带做过一番努力，他整顿吏治，所到之处裁革原有官吏，将自己认为比较清正的亲信补援进去，谁知两年之后，又都贪污腐败如初。但因为这些人当初又都是自己保荐上去的，所以又不好再将其都革职，否则不是自扣用人不当的罪名吗？整顿吏治的结果是只能自食苦果，装聋作哑，苟且偷安。

他减漕减赋。苏浙的太湖流域是全国最富的地区，但也是赋税最重的地区。1863年他曾和李鸿章搞过一次减税运动，想以此减轻中小地主和广大自耕农的负担，但最后也没收到一点效果，豪门巨绅仍然拒不纳税，地方官仍旧哄抬物价，从中牟利。

如果说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让曾国藩悲观丧气、忧心忡忡的话，人民群众的情况就简直令他坐立不安了。捻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而西北回民起义仍在继续进行，天灾人祸，饥民成群，社会秩序仍然混乱不堪。从此，曾国藩再也不提“中兴”一词了。

1869年9月13日，曾国藩接到清廷命令，调其为直隶总督。在此之前，他因为办事得力 and 剿捻有功已获得几次升迁。

在任职直隶期间，曾国藩仍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为清王朝办事，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继续练兵以对付造反的农民。另外他还治理了永定河，为京津一带人民做了一件实事。

然而，无论他怎样恪守尽职，曾国藩还是一天天地看清楚了，整个清王朝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船，只有看着它一天

天地沉没下去，自己再也无能为力了。

多年以来，曾国藩视力微弱常患晕眩之症。剿捻失败后，他不仅忧愧丛集，在精神上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愈来愈差。1869年秋冬以来，曾国藩的视力继续下降，看字如隔了一层雾，看书时间一长，眼睛就更不行了。第二年春天，曾国藩的右眼完全看不见东西了，左眼看东西也只能模模糊糊，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已极其困难。偏偏这一年直隶又逢大旱，小麦颗粒无收，全省人民人心惶惶，饥民到处闹事。曾国藩只得强打精神，勉强支持，但撑到后来终于卧床不起，只好请假在家休养一个月。据医生讲，这是由于焦劳过度引起的，所以建议他在家息心静养。

正当曾国藩打算在家好好休养身体时，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曾国藩前往办理。

2. 办理天津教案

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些早先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便以“中国通”的身份，为侵略者出谋划策。

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签订，条约中规定，不但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而且中国政府还有保护教堂的义务。接着，他们又讹诈清政府取消了自康熙年间以来百余年的教禁，并将原来因为教禁没收的无主教堂一律发还教徒。另外《黄浦条约》还规定，法国传教士出入中国各地，如果

犯法中国官员可以将其缉拿，但要送到法国领事馆听凭他们处理，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或虐待他们。

从此以后，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在中国大地上。他们办起了学校、医院、育婴堂，打着慈善的招牌，扩张侵略势力，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天津教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突然死亡三四十人，尸体自外腐烂，违背常情，人们都怀疑是教堂有意虐杀中国婴儿。与此同时，天津附近州县不断发生拐迷儿童的案件，拐迷儿童的犯人的口供也往往牵连教堂。

1870年6月19日，有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捉住，扭送天津县衙。武兰珍供称他是受教民王三的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提供的，并供称他先前曾经迷过一个小孩，得到五块银元的赏钱。这王三是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善良早就引起公愤。

这件事哄传出去之后，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要求将案犯、主谋之人都就地正法。但由于与外国人的条约中有规定，中国官员都不敢动他们。这次，天津的官员们引起了中国人的公愤，也不敢草率了事，怕中国人把事情闹大了。

6月21日，下午，天津民众聚集在法国教堂门口，与教堂人员发生口角，引起斗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中国地方官崇厚派兵前去镇压。后来见崇厚不肯出兵，他亲自带着护卫西蒙到崇厚的衙门寻衅，连续两次向崇厚开枪，幸好被人推开，没伤得着人。这时，衙门外已聚集了一大批天津市民，他们强忍怒气，静观事态发展。崇厚惟恐将事情

闹大，自己不好向上面交待，于是反而温言相劝丰大业在衙门内歇一会，等群众散去以后再回领事馆。丰大业不听劝告，反而狂吼着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外。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来，正在劝群众散开。其实当时有很多群众都听从劝告已经回家了，其他人也正在离去。他们见丰大业出来，纷纷自动后退，为他闪开通道。若丰大业不再寻衅，这场风暴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不料丰大业一见到刘杰，再次开枪行凶，打伤了刘杰的随从。围观群众再也无法忍受，当场将丰大业主仆打死，接着又冲进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搜出罪犯王三，救出被拐骗的中国儿童，随后又冲入外国人在天津设置的其他机构，先后打死殖民主义者和其他外国人 20 名，烧毁其侵略据点几处。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法国联合英、俄、美等七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派军舰到华北沿海进行武力威胁。怯懦无能的清政府在国外侵略者的恫吓下，立刻派崇洋媚外，厚颜无耻的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同时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此案。

曾国藩此时对清政府前途已极为悲观，最怕发生异常变故，尤其害怕外国人打来，清政府又命自己与洋人开仗。因而，一听到天津群众打死法国领事，烧毁教堂，立刻陷于一片惊恐之中。他认为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必然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激成大变，自己身心本就憔悴，也很可能在这场战争中丧命。因而，他再次写下遗嘱，向长子曾纪泽交待后事。

7 月 8 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天津市民正在怨恨崇厚

坦护教会,都希望曾国藩来到之后能一反崇厚的媚外政策,公平办理此案。

但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与洋人议和,只要能不引起战争,什么条件都答应。

所以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立刻下令将罪犯武兰珍和王三释放,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他虽然明知这样做,事后必然遭到万民唾骂、舆论谴责,但为了讨洋人欢心,不致使事情闹大,曾国藩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一意孤行,最后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天津教案快速了结:搜捕群众,严刑逼供,正法 20 人,充军 25 人,赔偿白银 49 万两,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后判为革职流放黑龙江。

曾国藩一味讨好洋人,置中华民族大义于不顾的投降做法,立刻引起朝野内外,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曾纪泽都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曾国藩却据理力争,不断为自己辩护,说什么现在外国强盛,要想相安无事,只能对外求和,委曲求全,否则只能引起更大的灾难。他还大肆歪曲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部和、战两派的斗争史,以及中外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是非界线,将一切罪过归咎于对外抵抗,将一切功劳推之于忍辱求和,从而得出一整套民族投降主义理论,作为他坚持媚外方针的依据。

由于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迫于朝野上下反对投降的呼声,也是为了推卸责任,于 1870 年 8 月 29 日中途换马,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办此案后,其实仍基本维持原议,只将

判死刑的由 20 名减至 10 名，4 名缓期，其他都全部未动。

曾国藩的投降主义政策由来已久。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是穆彰阿的忠实信徒，对他的屈辱求和倍加赞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正当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的危急时刻，他手握重兵六七万，却只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而不肯派 2000 人北援。因此，曾国藩如此处理天津教案绝非偶然，而是早有打算的。

早在帝国主义侵华之初，著名的爱国思想家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自从清政府内部分裂出洋务派和顽固派之后，这个口号似乎也被肢解了，他们各持一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力求使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不惜以牺牲民族利益的投降主义政策取媚洋人，换取“师夷长技”的条件，而将“制夷”一事推到遥遥无期的将来。曾国藩也曾在中国首办造船厂、安庆军械所等首批民族工业，但他制造出来的船只、大炮不是用来对付外国侵略者，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而是将它们瞄准了自己的同胞，为争取自己的名利而血腥屠杀。这是任何想为曾国藩正名的人无法掩饰的污点。

曾国藩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曾经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欢呼和赞美，一时被捧为“中兴名臣”、“旷代功臣”，简直成了盖世英雄。剿捻失败是他名声降低的起点，而处理天津教案却使他的声望一落千丈，转眼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汉奸”、“卖国贼”之名也纷纷而来。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何况早已是大病缠身、奄奄待毙的曾国藩？受了这场打击之后，曾国藩在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即匆匆死去。

结 束 语

曾国藩一生以 1853 年出办团练为界，大抵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究心举业、钻研学问为主；入京以后，他曾一度致力于程朱理学，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受时代的影响，他也兼顾了经世致用之学。这两者的结合，奠定了他尽忠清王朝的坚定信仰，同时也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注重研究一些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关心人民疾苦，具有一定的反侵略思想，但这种反侵略只流于空谈，一涉及到实际问题，他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投降政策。

曾国藩后期以从事军事、政治为主。太平天国的革命风雷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从而使他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曾国藩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具有 2000 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古国正处于蜕变的前夜。腐朽、顽固的封建势力在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携起手来，共同镇压人民的革命。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逼和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面前，为了苟全封建统治的生存，曾国藩和他的最高统治者一起选择了一条对内镇压、对外屈从的道路。

由于曾国藩一生严格执行这条道路，所以 100 年来受到

了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不同评价，有人赞他为“中兴第一名臣”，有人骂他“曾屠户”、“曾剃头”，也有人骂他“卖国贼”，这都是由于曾国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决定的。

今天，我们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正确评价他的是非功过，正确认识那个时代，对今天，对未来都有一定的实际意义。